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安徽省优秀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刘东锋等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  
宋增伟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王 岚等 信用数据“归治用”链路研究  
魏咏琪等 列宁对涉民族问题错误思潮的批判及其现实启示

2026年第3期（总第119期）  
第25卷 双月刊 5月30日出版

#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hfdx.hfzhi.com/>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中共合肥市委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 义 王 玉 王智源 江 飞

江 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 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马 俊

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

## 理论视野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

——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刘东锋 王玉堂(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宋增伟 周美婧(9)

“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和现实要求……………马勇(17)

## 策论园地

信用数据“归治用”链路研究

——以 Z 省为例……………王岚 陈海盛(23)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马俊 高洁(31)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230031  
(0551)62206658;62206629  
xb1233@126.com  
ISSN 1674-5000  
CN 34-1249/Z

\*\*\*\*\*

学思札记

列宁对涉民族问题错误思潮的批判及其现实启示.....魏咏琪 王永贵(37)

《怎么办?》中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生成理路、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种永恒 夏玉元(46)

信息荟萃

“做科技企业伯乐,安徽有心得”等六则.....(55)

#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

## ——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刘东锋 王玉堂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淄博 255049)

**[摘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党的二十大以来的最新发展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最新部署、最新要求。建设美丽中国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的必由之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共生性特点,深刻洞察自然生态演变规律、人类文明演进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新征程上,一定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和此前出版的第一至四卷作为一个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内容上不断丰富、体系上不断完善的有机整体,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理解、深刻把握、全面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擘画和系统部署,在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中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展现中华大地处处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生机与魅力。

**[关键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美丽中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以下简称《第五卷》),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推进新的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全书共十八个专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

示等91篇,其中开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和收入第十专题“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4篇重要文章,深刻阐释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重点任务和实践要求,不仅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党的二十大以来的新发展和以

收稿日期:2026-05-20

作者简介:刘东锋,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的新部署、提出的新要求,而且彰显了这一重要思想开放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

### 一、深刻理解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sup>[1]56</sup>,强调“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sup>[2]410</sup>。随着全球性生态问题加剧,人们不得不反思这些问题的由来,不得不反思人与自然应该如何和谐相处,由此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尊重自然是一种大情怀,顺应自然是一种大智慧,利用自然是一种大学问。《第五卷》开篇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鲜明提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sup>[3]38-39</sup>《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一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sup>[3]334</sup>《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文进一步指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sup>[3]326</sup>美丽中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建设美丽中国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的必由之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共生性特点,深刻洞察自然生态演变规律、人类文明演进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着眼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sup>[4]208</sup>,并作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sup>[5]644</sup>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sup>[6]19</sup>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sup>[6]39</sup>。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sup>[3]38</sup>,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sup>[3]19</sup>。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sup>[7]</sup>确立为我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七个方面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些重大论断、重要论述和一环紧扣一环的战略安排,深刻彰显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定位和战略意义。

(一)“美丽中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和重要支撑。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绿色环保、清洁美丽的国家。《第五卷》开篇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3]17</sup>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整体推进。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sup>[3]19</sup>,“全面”的内涵很明确,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美丽”既是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行的五大目标之一,又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重要支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sup>[8]39</sup>。大自然孕育了人类,“人靠自然界生活”<sup>[1]55</sup>,没有美丽中国建设带来的良好生态环境、深厚生态根基,就不可能

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同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sup>[3]79</sup>中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只有实现中国美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才更有成色、更可持续，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才能更加坚实。

(二)“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生态兴则文明兴。”<sup>[3]410</sup>一个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离不开良好生态环境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sup>[4]56</sup>，“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sup>[4]211</sup>。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表明，“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sup>[9]167</sup>。历史上，美洲玛雅文明的消亡、我国楼兰文明的终结，都有生态环境恶化的因素。“草木植成，国之富也”<sup>[10]42</sup>。“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sup>[3]330</sup>，“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依托”<sup>[6]374</sup>。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必须筑牢生态根基。只有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才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sup>[3]326</sup>，“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sup>[11]153</sup>，以生态兴带动产业兴、推动文明兴，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sup>[3]18</sup>上一步一步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为现实。

(三)“美丽中国”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绿色代表着生机与希望、清洁与美丽，“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sup>[6]367</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使命所在。”<sup>[6]359</sup>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包括对美好生活质量的向往，也包括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sup>[12]53</sup>。追求美好是人的天性，也是历史进步的原动力。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必然会同步提升，“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sup>[13]198-199</sup>。“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sup>[6]362</sup>。建设美丽中国，“美丽”的背后是良好生态、优美环境和由此带来的高质量发展、由此创造的高品质生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sup>[14]660</sup>。只有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元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持续增强美丽中国建设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而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sup>[6]374</sup>建设生态文明，“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sup>[15]</sup>，既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实践可以感受，理论需要领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必须以《第五卷》为基本教材，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丽中国建设的最新论述，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新发展，自觉用以谋划工作、指导实践，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 二、深刻把握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要求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这一重大战略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

现了“从重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向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跨越式转变”<sup>[16]</sup>。《第五卷》围绕“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收录的重要著作,既总结成绩、总结经验,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又部署任务、规划未来,牢牢把握美丽中国建设正确方向;既有“抓什么”的战略擘画,又有“怎么抓”的战术指导;既有施工图,又有方法论,贯穿着鲜明的实践要求。

(一) 加强党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sup>[19]292</sup>“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sup>[1321]</sup>。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sup>[19]274</sup>,靠的是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大政治优势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这一最大理论优势。新征程上,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sup>[18]</sup>。要健全党领导美丽中国建设的工作推进和落实机制,把党对美丽中国建设的领导贯穿到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sup>[19]292</sup>,“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sup>[4]210</sup>,“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sup>[19]292</sup>,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sup>[17]366</sup>的生态文明

建设格局。加快推进美丽中国保障体系建设,“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基础支撑和有力保障”<sup>[13]331</sup>。

(二)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国美丽,良好生态环境是基础;建设美丽中国,污染防治是首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密不可分、相互作用”<sup>[6]370</sup>,“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展广度,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sup>[13]326</sup>。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保持战略定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sup>[13]322</sup>,确保污染防治持续推进,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生态系统持续优化。“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sup>[13]323</sup>。要牢牢把握“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sup>[6]362</sup>的价值取向,“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sup>[6]368</sup>,围绕民之所急、民之所忧、民之所盼,持续推动问题解决、环境改善、生态优化,让人民群众在持续推进的美丽中国建设中源源不断地享受更多生态红利,真正因产业兴而具有满满的获得感、因中国美而具有浓浓的幸福感、因生态好而具有稳稳的安全感,更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三) 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sup>[13]398</sup>。解铃还须系铃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要靠绿色低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sup>[3]39</sup>,“越是发展任务重,越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sup>[19]</sup>。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作出战略部署,提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sup>[17]</sup>的目标。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以绿色化、低碳化为鲜明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sup>[20]</sup>,推动“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sup>[3]322</sup>。文化是一种成风化俗的力量。要大力培育生态文化,让人民群众在润物无声中接受生态文化熏陶,不断增强生态意识,涵养生态思维,形成生态自觉,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成为共识和行动,奋力书写美丽中国新画卷<sup>[21]</sup>。

(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有其自身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力”<sup>[3]322-323</sup>,“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这既是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的必然要求,也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不利影响的重要手段”<sup>[1]7364-365</sup>。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源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sup>[22]</sup>。要以系统思维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sup>[3]39</sup>,以系统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让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恢复应然状态。国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空间载体,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sup>[3]329</sup>,科学开展大规模国

土绿化行动,不断增加绿色资源总量。“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sup>[23]14</sup>,要强化多样性思维,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不断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坚持“道法自然”的生态顺应观<sup>[24]</sup>,“把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有机统一起来,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sup>[3]323</sup>,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

### 三、结语

领袖著作是领袖思想的重要载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和此前出版的第一至四卷,每卷都有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的专题,共同构成一个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内容上不断丰富、体系上不断完善的有机整体,系统呈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发展脉络、完善的科学体系、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提出为标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sup>[19]276</sup>。“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sup>[25]544</sup>,一切伟大的事业又都需要划时代的理论的指导。新征程上,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和第一至四卷作为一个整体,前后联系起来、贯通起来、融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理解、深刻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擘画和系统部署,锚定目标,奋力而为,在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中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sup>[13]38</sup>,展现中华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sup>[19]276</sup>的壮美和“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sup>[6]374</sup>的勃勃生机,“让人民群众在美丽家园中共

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sup>[3]23</sup>。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5] 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
- [8] 庄子[M].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 [9]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10] 管子[M].李山,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1]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12] 杨朝明.论语诠解[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3.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5] 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牢记初心使命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把祖国北部边疆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N].人民日报,2019-

07-17.

- [16] 孙金龙.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努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J].党建,2026(1):14-16.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8]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N].人民日报,2026-01-13.
- [19]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N].人民日报,2025-01-25.
- [2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2024年7月31日)[N].人民日报,2024-08-12.
- [21] 王玉堂.大力培育生态文化[N].贵阳日报,2026-01-05.
- [22] 杨小草,王玉堂.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5(5):3-8.
-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 [24] 孙新红,王玉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探析[J].理论与当代,2025(6):39-42.
-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责任编辑:朱少家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宋增伟 周美婧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国际传播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全面阐释了国际传播的主要内容、系统谋划了国际传播的实践进路,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党对国际传播的规律性认识,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新征程上,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可以为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 国际传播 战略价值 主要内容 实践进路

国际传播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纽带,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党和国家长期以来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主要内容、实践进路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党对国际传播的规律性认识,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

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 and 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sup>[1]316</sup>。新征程上,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可以为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年历程、经验及启示研究”(立项编号:21YJC71005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研究”(立项编号:JS2025ZSPY0097)。

收稿日期:2026-05-20

作者简介:宋增伟,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周美婧,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 一、深刻回答了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首先要明确国际传播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首先深刻回答了“为何要进行国际传播”这一前提性问题,以清醒的文化自觉,将国际传播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价值提到新高度。

### (一) 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国际传播不仅是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还包括将中国的价值观、理念、形象等向国际社会传播,是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要内容。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其中就包括“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sup>[3]152</sup>,这是从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方面,对当前和未来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国际传播的关系时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sup>[3]155</sup>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尤其“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sup>[3]156</sup>,不断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帮助我们厘清了国际传播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相辅相成的关系,做好国际传播能够推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 (二) 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

接体现。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然而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仍然存在对中国形象的“有色滤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存在的诸多困境,“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sup>[4]212</sup>。因此,增强中国形象的自塑能力,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成为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sup>[5]46</sup>。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引导我们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逐渐深入到每一位国际民众心中。

### (三)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然而,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各种矛盾交织演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国际敌对势力常常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将中国梦曲解为“霸权梦”,扣上“新霸权主义”的帽子,企图以此遏制中国崛起。其实,国际上有些人担心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意识形态壁垒等。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主动向世界准确而全面地讲述中国梦。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

述,向世界深入阐释中国梦绝不是“霸权梦”,因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sup>[6]134</sup>,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因而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相通的,从而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梦的理解和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 二、全面阐释了国际传播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全面阐释了“国际传播要传播什么”这一核心问题,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不断丰富新时代国际传播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五方面内容的国际传播,向国际社会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 (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国际传播

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面临诸多有利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国家发展成就那么大、发展势头那么好,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做了那么多好事,这是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的最大本钱。”<sup>[14]208</sup>这一论断指明了我国国际传播的主要内容。

一方面,展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总结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包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等16个方面,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sup>[5]15</sup>,也为世界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

善于讲故事、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向世界展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这是我们做好国际传播工作的最大底气。

另一方面,宣传我国为国际社会发展作出的新贡献。例如,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然而世界各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充满艰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sup>[7]434</sup>。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向世界集中宣传我国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为造福各国惠及世界、为携手谱写多极化世界文明进步新篇章作出的新的更大贡献,这成为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的坚实支撑。

### (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sup>[8]26</sup>。宣传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方面,讲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sup>[13]17</sup>。需要对外宣介的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外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

论述立足中国实践,讲清楚“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用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sup>[13]17</sup>,向世界展示蕴含中国智慧的理念、主张和方案,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另一方面,做好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等的精准国际传播。这些思想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根据国际社会需要,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和重点传播,进而提升整体的国际传播效能。例如,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主要是讲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等内容。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题,明确指出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sup>[13]265</sup>,增进了世界各地民众对中国爱好和平、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形象的认识和理解。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诠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力量的重要价值理念。因此,对外传播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对外阐释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与世界意义,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方面,讲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深刻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sup>[3]161</sup>,更好地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展示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

另一方面,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同时以其内在先进性和彻底超越性,还是具有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观。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sup>[9]522</sup>。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理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契合,在国际传播中要讲清楚二者的关联,可以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感召力和亲和力。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把目光投向世界,创作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sup>[1]325</sup>,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

### (四)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其独特而丰富的内容体系,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与文化根基,也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sup>[3]258</sup>,强调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中获得丰富

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方面,阐述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sup>[3]258-259</sup>,文明可以交流互鉴,也需要交流互鉴。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阐述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意义,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交流互鉴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sup>[3]262</sup>,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sup>[10]278</sup>。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强调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sup>[5]63</sup>,倡导世界各国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促进人类文明持续进步。

另一方面,讲好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引导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键要素,也是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内容。因此,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的应有之义。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sup>[7]287</sup>,有力回击了“国强必霸”的论调,展现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此外,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就是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要“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sup>[7]283</sup>,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

####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理念。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随后多次在重大场合深入阐释这一理念,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问题给出了系统的中国方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深入理解,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方面,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到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再到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倡议,实现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sup>[11]58-59</sup>,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目标,做到“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sup>[11]475</sup>。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意蕴,不断彰

显其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阐释四大全球倡议。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也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核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来破解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问题,“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sup>[12]</sup>。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阐释四大全球倡议,为破解全球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和决心。

### 三、系统谋划了国际传播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不仅明确了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主要内容等关键问题,还深入探讨了“如何推进国际传播”,即系统谋划了国际传播的实践进路,将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提升到新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从协同多元主体、加强受众分析、讲好中国故事、拓展传播渠道、注重效果评估等五个维度进行实践推进,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一)协同多元主体,明确各主体的传播职责

新时代国际传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多方资源、凝聚多方力量,形成多方参与、职责明确、高效协同的国际传播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动员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舆论工作,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发展”<sup>[1421]</sup>。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

述,强调要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发挥各传播主体的优势,让政府、媒体、企业、社会组织、智库、个人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实现官方主体与非官方主体的有机结合,形成国际传播的协同合力。

一方面,发挥官方主体的主导作用。官方主体主要包括党和政府、官方主流媒体等,具备权威性和公信力,是国际传播的主导力量。坚持党对国际传播的全面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国际传播的各环节各方面,确保国际传播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要坚持党对国际传播的全面领导,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sup>[1318]</sup>。官方主流媒体要积极承担外宣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sup>[1370]</sup>,指出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要承担起国际传播使命,成为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发挥非官方主体的重要作用。非官方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社会组织、智库、个人等,更为灵活多样,也是国际传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例如,发挥企业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企业要积极“走出去”,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积极塑造国家形象,“各类企业要规范经营行为,决不允许损害国家声誉”<sup>[1497]</sup>。发挥智库的人才资源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高端智库交流渠道,“要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 and 渠道发声”<sup>[1318]</sup>。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协同发力,才能把中国故事讲得

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

(二)加强受众分析,提高国际传播的精准性

国际传播受众即国际传播的对象,其接受情况直接影响国际传播效果。然而,当前我国国际传播受众复杂多样,增加了国际传播的难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sup>[13]18</sup>可见,必须加强国际传播受众的分析研判,提高国际传播的分众化、精准化。

一方面,坚持平等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sup>[14]340</sup>。国际传播受众是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习俗、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群体,国际传播应当是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互鉴、共同进步。另一方面,坚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受众阅读习惯和信息需求的深刻变化,一些媒体还是按老办法、老调调、老习惯写报道、讲故事,表达方式单一、传播对象过窄、回应能力不足,存在受众不爱看、不爱听的问题”<sup>[14]39</sup>,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国际传播效果,导致声音总体偏弱偏小。因此,要加强对国际传播受众的分析研判,做到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采用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采取符合不同受众阅读习惯、接受习惯和兴趣特点的传播方式和叙事技巧,以提高国际传播的精准性。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非常重视来华留学教育,将其作为中外互通的重要窗口,希望来华留学生多向世界讲讲他们所看到的中国。

(三)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新时代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sup>[13]17</sup>。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国际传播内容,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不断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sup>[14]212</sup>“五个讲好”涵盖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各方面,用故事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sup>[14]212</sup>,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使国外受众想听爱听。另一方面,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sup>[14]213</sup>因此,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将“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以讲故事的形式向各国民众娓娓道来,阐述好蕴含其中的“道”,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四)拓展传播渠道,开辟国际传播的新场域

国际传播的覆盖面和到达率有赖于传播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sup>[17]296</sup>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重要论述,重视拓展国际传播的平台和渠道,也注重依托信息技

术创新,打造信息化国际传播平台。

一方面,建好用好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合作平台为我国推进国际传播、展示国家形象提供了重要渠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sup>[17]463</sup>。例如,2023年12月3日,浙江省杭州市举办首届“良渚论坛”,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文化领域的重要延伸,为共建国家文明交流对话提供了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上海合作组织“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理论和实践探索”<sup>[14]30</sup>。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深化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举办青年交流营、妇女论坛、民间友好论坛等品牌活动,宣传中国的价值理念和发展成就,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另一方面,打造信息化国际传播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sup>[4]31</sup>,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可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sup>[15]319-320</sup>,积极打造信息化国际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不断提升国际传播效率,让中国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

(五)注重效果评估,持续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国际传播的效果评估,是衡量国际传播效能、提高国际传播针对性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用系统观念分析国际传播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提出“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sup>[1]316</sup>的“五力”目标,不仅是加强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检验国际传播效果的科学指标,为我们开展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提供了重要遵循。

第一,评估国际传播影响力,关键在于是否形成有效的国际传播。评判是否形成有效国际传播的关键在于传播内容是否有效抵达国外受众,是否产生预期的国际传播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确保传播渠道畅通,传播内容直达受众心底。第二,评估中华文化感召力,关键在于是否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向世界宣介具有中国智慧、彰显中国特色、蕴含中国精神的中华文化,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第三,评估中国形象亲和力,关键在于是否形成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第四,评估中国话语说服力,关键在于是否实现“传者扬其意而受者晓其理”的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这是形成中国话语说服力的重要基础。第五,评估国际舆论引导力,关键在于是否提升我国在国际舆论场的控场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时、度、效,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增强议题设置能力,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总之,要通过“五力”指标,以评估促改进,持续提升新时代国际传播效能。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
- (下转第30页)

# “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和现实要求

马勇

(宁夏区委党校,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论断。深入理解“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需遵循发展逻辑,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青年工作观到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青年工作的优良传统,再到新时代青年工作实践的规律总结的发展脉络来把握这一论断的生成逻辑。需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基于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和保障青年健康成长成才的现实诉求挖掘这一论断的价值意蕴。需坚持和运用战略思维,系统谋划青年工作、保持定力做好青年工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青年工作 战略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sup>[1][3]</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sup>[2][7]</sup>,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青年工作的战略性思考,全面理解与把握这一论断的基本要义与内在要求,对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 一、“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的生成逻辑

### (一) 赓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青年工作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注重青年工作,指出青年是工人阶级事业的未来、是实现旧社会向新社会变革的先锋、是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带头人,青年工作必须紧紧团结青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及提升研究”(立项编号:22CKS06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立项编号:18JZD050)。

收稿日期:2026-05-22

作者简介:马勇,中共宁夏区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代,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变革蓄势待发,面对这样的形势,他们指出“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sup>[3]629</sup>。肯定了青年承担历史重任、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历史作用。马克思认为接受教育的青年既是工人阶级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他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sup>[4]217</sup>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青年大学生“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sup>[5]435</sup>充分肯定了青年在无产阶级斗争事业中所具有的神圣使命与社会作用。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寄语青年,指出“你们应该是千百万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带头人,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成为这样的建设者。”<sup>[6]337</sup>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工作的战略性认识,为新时代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提供了根本遵循。

## (二) 传承党一贯重视青年工作的优良传统

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强调青年工作要紧紧依靠青年、牢牢团结青年、教育引导青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是革命的有生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团结的重要群体。毛泽东立足革命事业需要指出,青年人“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sup>[7]17</sup>充分肯定了青年工作在党的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立足党和国家新任务的需要,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围绕如何做好青年工作向青年团

提出了要求,指出青年团要“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sup>[7]57</sup>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国家科学事业落后的现实状况,指出“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sup>[7]133</sup>。江泽民在同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座谈时指出,“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党和国家对青年人始终充满着殷切的希望”<sup>[7]207</sup>。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sup>[8]</sup>。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紧紧依靠青年、牢牢团结青年、教育引导青年。

## (三) 总结新时代青年工作实践的规律

青年工作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这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青年工作规律的深刻总结。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深刻总结到,“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sup>[9]164</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青年工作出现新变化新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sup>[9]23</sup>,“祖国的未来属于青年,重视青年就是重视未来”<sup>[9]111</sup>。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sup>[10]8</sup>党领导青年工作,不断从实践中总结青年工作的规律,为党和国家事业提供战略支撑作用。

## 二、“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的价值意蕴

### (一) 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国家事业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sup>[11]</sup>“青年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中国青年才会有力量,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才能充满希望。”<sup>[11]</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sup>[23]</sup>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尤为需要青年,需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

第一,党和国家依靠青年传承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sup>[12]</sup>青年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力军,青年群体只有不受“丧文化”、“躺平文化”等亚文化的影响,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才能将党和国家事业传承下去。

第二,党和国家依靠青年发展事业。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既需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又需要应对各类矛盾风险挑战,党和国家希望青年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任务”,“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勇当先锋队、突击队”<sup>[14]</sup>。

第三,党和国家依靠青年创新创造。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sup>[19]</sup>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要发展,就需要高度重视青年在创新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方面,需要青年冲破关键技术壁垒,不断推动事业发展。

## (二)保证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sup>[26]</sup>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青年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第一,确保青年工作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青年工作是党的工作中一项战略性工作,党的需要就是青年工作的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工作的方向就是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确保党的革命事业顺利推进,早日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青年工作的方向就是团结广大青年一心搞建设,早日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青年工作的方向就是号召青年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青年工作的方向就是响应党的号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正是因为始终坚持正确方向,青年工作才没有偏航,青年才牢牢团结在党的周围。

第二,确保青年工作始终获得全面支持。青年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一方面,它的开展需要物质力量的支持,如人才培养与培训、先进工作技术的供给、充足的工作经费支持等;另一方面,青年工作的开展也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持,如营造重视青年工作与关爱青年的氛围、推进青年工作与时俱进的信心与信念的强化、为青年工作积极奉献精神的宣传与弘扬等,让青年工作在良好氛围中不断推进,实现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

第三,确保青年发展始终拥有广阔平台。中国共产党为青年发展提供广阔的国内平台。中国共产党始终心系青年,为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提供广阔平台,为青年发展创造机遇。同时,中国共产

党为青年发展提供广阔的国际平台。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为青年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平台,汇聚青春力量。

### (三)保证青年群体健康成长成才

第一,始终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sup>[13][178]</sup>党的创新理论是“两个结合”的成果,是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是“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原因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sup>[216]</sup>。因此,确保青年的人生方向不偏,就必须始终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

第二,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青年。青年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sup>[1216]</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的理想,不是为少数人或少数集体谋取利益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青年,引导他们将人生道路选择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统一起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第三,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团结青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sup>[1219]</sup>的情况下,它的进步性、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更加凸显。引导青年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体悟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科学性,进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团结青年,并且依靠制度为青年提供良好的平台,促进青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 三、“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的现实要求

战略往往指向长远、事关根本、触及核心。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需要树立战略思维系统谋划青年工作、保持战略定力做好青年工作。

### (一)用战略思维谋划青年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sup>[1131]</sup>用战略思维谋划青年工作,关键在于始终注重青年工作的整体性、全局性、长期性。

第一,始终注重青年工作的整体性。青年工作是由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青年发展支持工作、青年管理服务工作等组成的统一整体。始终注重青年工作的整体性,要对整体工作的设计与架构进行通盘考虑,如目前的工作结构是不是已经完备?随着时代的发展是否需要增补新的工作板块?也要考虑每一个工作板块在整体工作架构中的比例,如青年管理服务工作在整体工作中应当占比多少?尤其是作为生命线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青年工作中占多大比重较为合适?同时,组成青年工作的每一个板块都有独特的价值与优势,要考虑青年工作每一个板块的独立运行,还要考虑工作板块之间的衔接与协同,才能保证工作效果最优。

第二,始终注重青年工作的全局性。“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sup>[12160]</sup>注重青年工作的全局性,要处理好青年与世界的关系。青年既要以正确的态度放眼望世界,也要以中国立场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为世界发展贡献

智慧和方案。要处理好青年与时代的关系。“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sup>[12]63</sup> 青年生逢其时,既面临各种风险挑战,也有大好发展机遇。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不仅仅影响着青年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实现什么样的价值,还影响着时代的前进方向。要处理好青年与历史的关系。“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sup>[12]7</sup> 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sup>[14]17</sup>,“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sup>[15]223</sup> 青年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历史大势、是否能够积极顺应历史潮流、是否能够掌握历史主动、是否能够抵制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是否能够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为历史发展作出贡献,都将直接影响新时代新的伟大斗争的结果。

第三,始终注重青年工作的长期性。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梦想与机遇,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困惑与挑战,注重青年工作的长期性,既因为青年自身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因为青年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青年在奋斗过程中,可能会受到“躺平文化”、“丧文化”、“摆烂文化”等消极文化的侵蚀,产生懈怠、沮丧甚至逃避的不良情绪,这就需要始终关心关爱青年,长期做好服务与团结青年的工作。只有注重青年工作的长期性,坚持应时与谋远的辩证统一、阶段性与长期性的辩证统一,青年工作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 (二)保持战略定力做好青年工作

保持战略定力做好青年工作,关键在于始终保持做好青年工作的战略自信、战略清醒、战略意志。

第一,始终保持做好青年工作的战略自信。保持做好青年工作的战略自信何以可能?一方面,“青年一代更加积极向上”<sup>[2]10</sup>的精神面貌为保持做好青年工作的战略自信提供了可能。青年群体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听党话跟党走信念是坚定的,我们有信心继续做好青年群体的引领与团结工作,创造新的历史业绩。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关于青年工作的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为保持做好青年工作的战略自信提供了可能。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工作,既有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理论上的深邃思考,也有目标上的科学设定和工作上的战略部署;既有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对优良传统的发扬,也有对现实的关照和对挑战的警醒;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国际理论的批判与借鉴,青年工作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得以彰显。

第二,始终保持做好青年工作的战略清醒。青年工作与党和国家其他工作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青年工作的某一过程或某一环节出了问题,不仅仅影响青年工作本身,还牵动工作全局。同时,青年工作还很复杂,“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sup>[16]2</sup> 而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并做到“精心”、如何营造引导与栽培青年的良好环境、如何科学评价引导与栽培青年的工作质量等,需要以战略眼光积极探索、长期谋划。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sup>[2]14</sup>,如何有效地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青年,确保青年始终坚定跟党走的信心,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而不被错误思潮所裹挟、所误导,需要始终保持做好青年工作的战略清醒。

第三,始终保持做好青年工作的战略意志。做好青年工作,既需要坚持正确的工作方向,也需要满怀积极的工作热情,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sup>[12]70</sup>始终保持做好青年工作的战略意志,有利于巩固青年工作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注重团结与依靠青年群体,支持与鼓励青年发挥重要力量,引导与培养青年健康成长成才。党领导下的国内各级各类青年组织不断涌现且日益壮大,选树的青年模范成为社会学习的榜样,与国际接轨的各类青年互动与发展平台不断完善,与青年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相继出台且不断完善。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部分敌对势力渗透的关键对象,敌对势力往往利用金钱诱惑青年,利用错误思想观念侵蚀青年思想,使一些青年迷失自我。只有始终保持做好青年工作的战略意志,才能在事关青年健康成长的方向、道路等原则性问题上坚定立场,“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sup>[12]27</sup>,坚持青年主体地位,充分体现青年意志,确保党的青年工作行稳致远。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7]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
- [9]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1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1] 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切实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 充分激发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N].人民日报,2023-06-27.
- [12]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徐书琴

# 信用数据“归治用”链路研究

## ——以 Z 省为例

王岚 陈海盛

(浙江省信用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本文以 Z 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编制与归集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信用数据“归集—治理—应用”全链路建设现状、深层障碍与优化路径。研究发现,Z 省通过编制 2025 版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已实现 372 个信息项中 92% 的归集完成率,累计归集信息 18 亿余条,数据质量核心指标持续向好。然而,重要数据获取难、数据质量“低质固化”、部门协同机制不畅、安全与流通双重制约等问题依然突出。基于此,本文提出强化专项协调与制度攻坚、构建“归治用”一体化闭环、深化长效治理与动态优化、创新安全合规利用与授权运营机制等对策建议,以期为公共信用数据治理与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信用数据 数据归集 数据治理 数据要素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公共信用数据作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基础性资源,其归集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政府建设与社会信用体系效能。近年来,Z 省将公共信用数据归集治理作为数字政府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系统谋划、持续推进。自 2016 年以来,已先后编制 7 版公共

信用信息目录,推动归集范围不断拓展、数据质量持续提升,为全省信用体系建设与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贯彻落实“夯实‘信用 Z 省’建设的数据基础”的要求和《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5 年版)》的新要求,Z 省开展《Z 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2025 版)》(以下简称 2025 版目录)编制工作,并全力推进相关信息归集和治理工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信用体系创新路径研究”(立项编号:23&ZD176);宁波财经学院高级别科研培育项目“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逻辑、定量评估与优化思路”(立项编号:1320263201)。

收稿日期:2026-05-21

作者简介:王岚,浙江省信用中心经济师,信息管理部副主任。陈海盛,宁波财经学院数字经济与产业创新研究院社会信用研究中心主任,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

本文基于 Z 省公共信用数据归集治理的实践探索,系统分析当前面临的深层障碍,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公共信用数据治理与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提供参考。

## 一、信用数据归集治理的实践进展

### (一)目录编制对标提质

2025 版目录严格对标《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5 年版)》的顶层设计,在确保合规承接的基础上,结合 Z 省信用建设特色场景进行本地化增补与动态优化。编制过程中,省发展改革委(省信用办)会同省级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经多轮征求意见、专题会商与联合评审,逐项逐字段敲定目录内容,确保每一条信息项均有明确的归集依据、共享权限和使用场景。最终形成的目录体系覆盖 63 个省级部门及全部 11 个设区的市,共纳入 372 个信息项,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域信用信息归集格局。相较于上一版本,2025 版目录较上一版实现显著优化,重点对评价类、荣誉类、协议类等信息字段标准进行统一规范,全面提升目录的严谨性、权威性与实际应用支撑能力。

### (二)归集任务高效落实

为保障目录落地见效,Z 省建立了常态化的部门对接沟通机制,由省信用中心牵头,通过联席会商、联络员对接、月度进展通报等方式,与 63 个省级部门和 11 个设区的市保持高频互动,逐项跟踪各信息项的归集进展、质量反馈和技术适配情况,确保发现问题即时响应、归集堵点及时疏通。截至目前,根据 Z 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数据,372 个应归信息项中,归集完成率已达到 92%,合计归集信用信息超过 18 亿条,覆盖企业、个体工商户、社会组织及重点人群等各类信用主体。绝大部分 2025 版目录信息项已实现常态化、自动化稳定归集,信

息完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较历年均有较大提升,为全省信用评价、分级监管和便企惠民应用提供了更加扎实的数据底座。

### (三)数据质量系统提升

围绕数据质量提升,Z 省构建了“核查—整改—监测”全链条治理闭环。在核查环节,依托数据质量管控平台,对 372 个信息项开展字段级精准核查,从完整性、规范性、逻辑性、时效性等多维度设定校验规则,实现问题数据的自动识别与精准定位;在整改环节,建立工单化闭环处理流程,对核查发现的问题数据自动派发至对应提供单位,明确整改时限和标准要求,并跟踪复核整改结果,确保问题“发现一个、解决一类”;在监测环节,搭建可视化数据质量驾驶舱,对归集率、完整率、及时率、准确率等核心指标进行实时动态展示和趋势预警,实现质量态势一屏掌控。通过这一闭环机制的持续运转,全省公共信用数据质量核心指标稳步向好。目前,根据 Z 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数据,372 个信息项中,字段有效性大于 90%的信息项占比已达 74%,超过九成的数据项在时效性方面表现良好,能够满足信用评价、风险预警和监管应用对数据鲜活性与可靠性的实际需求。

## 二、信用数据归集治理的深层障碍

### (一)重要数据难以获取,影响信用体系的完整性

部分高价值数据因制度障碍难以获取,导致信用画像关键维度缺失<sup>[1]</sup>。一是国家事权数据获取难,如“商标质押登记信息”、“出口管制领域违法信息”及中央垂直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信息,管理权限在国家部委,省级缺乏直接获取渠道。二是数据共享受制于法律法规或主体授权要求,如“法人/自然人电力缴费信息”“电费信息”“纳税信用评价信息”等,无法批量无条件共享。三

是部分数据客观上尚未产生或相关事项尚未实际开展,且在目录征求意见阶段相关部门未提出异议,如“注册会计师行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专利代理行业信用评价信息”“商标代理行业信用评价信息”等,实际工作未启动或非国家试点,导致无数据可归集,无法满足国家目录要求。

(二)数据质量陷入“低质固化”循环,制约数据有效应用

当前部分数据归集工作仍存在“为归集而归集”的倾向,重形式共享、轻内容实效,导致部分已归集数据的质量短板突出,直接影响使用效益与持续治理动力。具体表现为:一是数据质量源头管控不足,历史存量数据缺乏有效整改机制,新增数据又未能在生产环节嵌入质量规则,导致如省建设厅“企业获奖信息”等数据“带病归集”。二是数据更新不及时,部分信息未按目录要求实现动态更新,例如“无线电频率占用费逾期未缴纳”“科技人员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信息”“人事考试违纪信息”等。三是关键主体标识缺失严重,如在“杰出教师”“巾帼建功标兵”等信息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的覆盖率低于50%,造成数据难以有效关联与深度利用。上述问题共同导致数据使用意愿降低,信用应用面临“想用不敢用”的困境,进而削弱了各部门持续提升数据质量的内生动力,形成“低质数据—低效应用—弱化治理—低质数据”的恶性循环。

(三)部门协同与责任界定不清,归集协同机制不畅

尽管目录编制与归集实施在顶层设计上保持衔接,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脱节,跨部门协调机制有待进一步强化。一是跨部门数据归集的责任主体难以清晰界定,例如涉及省医保局与省税务

局共同管理的“职工医疗保险费欠缴信息”,以及省人社厅与省税务局交叉负责的“社保欠费企业信息”,相关管理链条分属不同部门,业务环节相互嵌套,缺乏明确的单一供给责任主体,导致上述信息项在实际归集中职责不清、推诿扯皮,长期未能满足城市信用监测体系对数据完整性和连续性的刚性要求,已成为制约信用评价覆盖面的突出短板。二是当前主要依赖“点对点”的沟通协调模式,各信息项由省信用中心分别对接相应的数源单位,虽能解决个别具体问题,但面对职责交叉、标准分歧等系统性障碍时,缺乏高位统筹和多边协商的平台化机制,问题处理周期长、反复率高,难以从制度层面形成长效解决方案。三是在目录编制阶段的前期评估仍显不足,部分数源单位在参与目录编制时,未能充分结合本单位业务系统的实际数据产生能力、技术接口条件及历史数据积累状况,对归集可行性缺乏审慎研判,导致部分新增目录信息项在发布后长期无法完成归集,出现“目录已列、数据难归”的悬空现象,既削弱了目录的严肃性,又增加了后续数据治理的成本。

(四)数据安全性与流通双重制约,影响应用稳定与价值释放

一方面,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深入实施,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对数据安全分级分类管理要求的持续细化,部分领域公共信用数据共享口径逐步收紧,审批流程日趋严格,已对既有信用应用系统的稳定性形成现实挑战。以税务系统的纳税信息为例,该类数据因涉及企业核心经营隐私,在共享范围、使用方式及传输频次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部分应用场景面临信息供给中断或更新频次大幅拉低的风险,导致已建成的信用评价

模型、风险预警产品和联合奖惩策略可能因数据“断流”而失效或失真,直接影响到分级分类监管的精准性和“信易贷”等便企服务的连续性,进而对政府公信力和市场主体获得感造成隐性损害<sup>[2]</sup>。另一方面,当前公共信用数据的共享流通仍主要停留在政府内部的纵向流转和横向交换层面,面向金融机构、征信机构、行业平台及社会公众等外部主体的数据要素化渠道尚不畅通,信用数据的市场化定价、合规授权和产品化开发进展相对缓慢,与宏观经济运行、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经营等多源信息的跨区域融合分析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支撑政府宏观决策、产业风险预警及区域经济治理等深层次应用场景,制约了信用数据要素价值的充分释放。安全合规压力与流通渠道不畅相互叠加,构成了信用数据深度利用与效能转化的双重制度性障碍,亟待从制度设计、技术支撑和生态构建等维度协同突破。

### 三、促进信用数据“归治用”提质增效的路径

#### (一)强化专项协调与制度攻坚,破解核心数据归集壁垒

针对数据在部委、授权受限、职责交叉等省级层面难以独立解决的系统性障碍,建议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专项协调机制。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打破条块分割的固有格局,以“高位推动、清单管理、法治保障”为抓手,形成纵向贯通国家部委与央企、横向厘清省级部门权责边界、底层筑牢法规根基的立体化破解路径,切实将数据资源的“堵点”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增长点”。

一是强化纵向联动,由省数据局牵头对接相关国家部委及央企总部,专项争取数据回流、结果核验等政策与接口支持,着力解决税务、电力、海关等领域高价值数据获

取难题。具体而言,应建立“一部门一专班”对接机制,针对税务发票数据、电力负荷数据、海关进出口报关数据等核心垂直管理数据,逐一梳理其归属部委、数据标准、返回频次及安全管控要求,形成差异化争取方案。对于数据回流,可依托国家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申请设立省级数据回流试点,推动国家层面将已采集的地方主体数据按属地原则全量回传;对于结果核验,可争取授权省级平台通过接口调用方式,实时核验企业纳税信用等级、用电异常、通关合规等关键信息,避免重复填报与人工核验。同时,主动对接央企总部,在能源、金融、通信等领域探索“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联合计算模式,以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手段破解“不愿给、不敢给”的困境。此举预期在一年内实现3至5类高价值数据的稳定回流或接口可用,为省级经济运行监测、企业精准画像提供高质量数据底座。

二是横向厘清权责,由省数据局牵头,系统梳理跨部门数据供给责任,并将其纳入部门责任清单。当前,部分部门将数据视为“私有资产”,以保密、安全为由消极对待共享义务,而职责交叉时又相互推诿,导致企业、群众办事仍需反复提交相同或大致相同的材料。为此,应依据《Z省公共数据条例》及“三定”规定,逐项明确数据提供部门、更新频率、格式标准、质量校验规则及异议处理流程,形成覆盖省级所有部门的“数据供给责任清单”,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同步建立“数据供给红黄灯”预警机制,对未按期提供、质量不达标或响应超时的部门,由省数据局予以通报并纳入年度数字化改革绩效考核。通过刚性约束,倒逼各部门将数据共享从“额外任务”转化为“法定职责”,切实消除“多头采集、数据打架、共享不畅”的顽疾。

三是加快修订《Z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为敏感数据依法依规归集提供明确法规依据。当前，税务欠税信息、电力欠费记录、海关失信行为等涉及企业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数据，在归集用于信用评价时存在法规依据不充分、归集边界模糊等问题，导致基层执行时要么“不敢归集”，要么“乱归集”。建议在修订中，重点明确三类条款：其一，界定“敏感公共信用信息”的范围，严格限定其用于行政监管、财政补贴、公共资源交易等法定场景，杜绝泛化使用；其二，增设“数据主体权益保障”专章，明确查询、异议、更正、投诉等救济路径，平衡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其三，建立“信用修复与数据删除”联动机制，对已履行义务的市场主体，按规定期限删除负面记录，体现包容审慎监管原则。修订工作应广泛征求企业、法律专家及公众意见，确保法规既具前瞻性又具操作性，为Z省率先探索敏感数据合规归集与安全利用提供坚实法治支撑。

（二）构建“归治用”一体化闭环，系统提升数据质量

当前，全省数据归集规模已实现跨越式增长，但实践中仍普遍存在数据口径不一、更新滞后、字段缺失、冗余重复等质量问题，导致“有数不好用、有用数不够”的困境日益凸显。推动数据工作重心从“规模归集”向“质量提升”转变，已刻不容缓。必须构建“归集—治理—应用”一体化闭环体系，以质量为主线贯通全链条，真正让数据从“原料”转化为“资产”。

一是建立目录编制与归集实施的联动机制，从源头破解“编归脱节”顽疾。长期以来，数据目录编制往往由技术部门独立完成，与数源单位实际供给能力相脱节，导致大量目录项虽列在清单上，却因格式不匹配、接口不支持、更新无保障而无法实际归

集应用。为此，应建立“双向会商+标准前置”的联动机制：在目录修订阶段，由省数据局组织数源单位业务骨干、技术支撑方共同参与，逐项确认数据字段、格式规范、交付频率、接口协议及异常处理规则，确保每一项目录均具备明确的可归集路径和应用场景支撑。同时，建立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每季度根据应用反馈和业务变化，对数源单位无法履约或价值不高的目录项予以清理，对高频急需的目录项优先升格，实现目录“编制有据、归集有方、应用有效”。

二是实施数据质量源头管控，将校验防线前移至业务产生端，并系统治理历史存量问题。数据质量“事后纠错”成本极高，“事前拦截”是最优选择和治本之策。省数据局应牵头制定省级统一的数据质量校验规则库，涵盖完整性、唯一性、规范性、有效性、时效性等多个维度，并推动该规则库以插件或接口形式嵌入数源单位的核心业务系统，在数据生成的“第一公里”即完成自动校验，对不合规数据实时提示修正，从物理上杜绝“脏数据”进入归集通道。与此同时，对已归集的历史存量数据，按领域、按批次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对税务、社保、企业登记等基础数据进行“全面体检”，通过关联比对、人工核验、跨部门交叉验证等方式，逐一解决缺项补录、错误更正、重复合并、失效清理等“历史欠账”。配套建立数据质量月度通报制度，以“红黄绿”三色标注各数源单位所提供数据的质量状况，倒逼日常维护责任落实。

三是强化“以用促治”，在“信用+”系列重点场景中明确硬性质量要求，驱动治理与应用双向奔赴。数据质量的高低，最终要在应用中接受检验。重点聚焦“信用+融资服务”“信用+惠企政策”“信用+风险监管”等高频场景，逐场景制定数据质量准入

标准——例如,企业信用评价需确保纳税、社保、公积金等核心指标字段完整率不低于98%,更新延迟不超过3个工作日。凡不满足质量标准的数源单位,其数据暂不纳入应用模型,直至整改达标。通过场景应用对质量的严格要求,促使数源单位主动提升数据采集、审核、上传各环节的精细度;同时,应用过程中发现的疑点、错点、断点问题,要及时反馈至治理环节,形成“应用发现问题—治理修正问题—归集更新数据—应用验证效果”的闭环。如此,治理不再是无方向的“为治而治”,应用也不再是“将就使用”,真正实现问题倒逼治理、治理提升应用的正向螺旋。

(三)深化长效治理与动态优化,保障归集工作可持续

推动信用数据归集治理,不能仅作为阶段性任务或技术性工作来推进,必须将其纳入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整体布局,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统筹谋划。要健全覆盖归集、治理、应用全生命周期的长效机制,推动各项工作从“突击式整治”转向“常态化运转”,从“粗放式管理”转向“规范化运作”,真正让信用数据成为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的“基石”。

一是高起点谋划,探索研究信用数据资源体系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分阶段归集、治理与赋能目标。信用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建议由省发展改革委(省信用办)牵头,联合省数据局及主要信源单位,围绕“数据底座夯实期、质量提升攻坚期、赋能应用突破期”三个阶段,制定三年行动路线图。第一阶段(第一年)聚焦“应归尽归”,重点突破税务、电力、海关等关键领域数据归集瓶颈,实现信用信息目录覆盖率达到95%以上;第二阶段(第二年)聚焦“精准治理”,针

对历史遗留的残缺、错误、冗余数据开展深度清洗,建立信用主体统一标识,实现核心字段完整率提升至98%以上;第三阶段(第三年)聚焦“高价值赋能”,推动信用数据在金融信贷、政府采购、行业监管、基层治理等领域形成一批标杆应用场景,信用数据调用量年均增长不低于30%。通过分阶段、可量化、能考核的目标体系,确保信用数据资源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二是建立目录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紧密衔接国家目录更新与本省业务变化,定期优化信息项,确保目录可操作、可落地。信用信息目录是数据归集的“总纲”,但国家目录会随法律法规调整而更新,本省“放管服”改革、行业监管政策也会带来新的信息需求,若目录僵化不变,极易导致归集内容与实际需要脱节。为此,应建立“季度评估、半年微调、年度修编”的动态管理机制。省信用中心每季度对目录内各信息项的实际归集率、应用频率、用户反馈等进行综合评估,识别出“僵尸项”和“热需项”;每半年依据国家最新目录版本和省级业务部门的专项需求,启动一次信息项调整程序,可增设、合并或废止相关字段;每年底组织专家及部门联席会议,对目录整体框架进行系统性论证和修编。同时,在每次调整前,必须与数源单位逐一确认新增或变更信息项的技术可行性、内容合规性及供给成本,避免“目录更新快、落地实施慢”的尴尬局面,确保每一条目录项都能在业务端可操作、在技术端可落地、在应用端有价值。

三是完善常态化治理流程,依托省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健全数据质量“自动监测—智能派单—闭环处置”机制,推动治理从“专项攻坚”转向“长效运营”。以往的信用数据治理,往往依赖集中式专项行动,虽能短期见效,但难以持续保持高质

量。必须借助数字化手段,构建全天候、自动化的质量管控体系。具体而言,依托省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部署数据质量智能监测引擎,对归集入库的信用数据实施“秒级扫描”,自动识别缺失、格式错误、逻辑矛盾、时效超期等问题,并按预设规则自动生成整改工单,精准派送至相应数源单位的业务负责人;数源单位在收到工单后,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排查与修正,并提交核验反馈,系统自动复核通过后关闭工单,形成“发现—派单—处置—反馈—复核”的全流程闭环。同时,建立质量台账和知识库,对高频问题分类归档,定期向数源单位推送改进建议,帮助其从源头减少错误发生率。通过这一机制,将质量治理嵌入日常业务流程,变“运动式清洗”为“浸润式养护”,确保信用数据长期保持“高颜值、高价值”,为全省信用便企惠民服务提质增效提供持续稳定的数据动力。

(四) 创新安全合规利用与授权运营机制,促进数据价值有序释放

在安全合规这一基本前提下,如何将海量信用数据从“静态资源”转化为“动态资本”,是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一个关键命题。必须坚持“安全为先、合规为基、创新为要”的原则,系统拓展数据服务能力与价值释放路径,推动信用数据从支撑内部管理向赋能外部发展跃升。

一是以授权运营机制为突破口,推动信用数据与多源融合应用,构建产品创新与生态培育新格局。信用数据只有与宏观经济、产业运行、企业经营等多维度数据深度融合,才能释放乘数效应。建议依托省级信用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建立“数据可用不可见、用途可控可计量”的授权运营规则,面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科技企业、研究机构等市场主体,按场景授权其使用脱敏后

的信用数据资源。重点聚焦金融风险控制等场景,将企业信用报告与纳税等级、社保缴纳、水电能耗、行业景气指数等数据进行融合建模,开发“信用评分+行业风险预警”“信用画像+贷后动态监测”等可信可运营的数据产品,并通过“一次开发、多次调用、按效付费”的模式实现可持续运营。同时,以授权运营为纽带,吸引数据供给方、技术开发方、产品需求方、合规审计方等多主体协同参与,逐步培育形成“数据提供—联合开发—场景验证—收益反哺”的数据要素微生态,让信用数据在安全流动中创造增量价值。

二是积极探索“数据不出域”条件下的合规价值挖掘路径,以技术手段破解敏感数据“不敢用、不使用”的瓶颈。税务欠缴记录、电力欠费信息、海关进出口异常数据等,因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传统模式下很难直接归集共享。但借助隐私计算、联邦学习、可信执行环境等前沿技术,可实现在数据不离开原始数据库的前提下,完成跨域联合建模与统计分析。具体而言,可选取金融信贷风险评估作为试点场景,由省信用中心联合税务、电力等部门及商业银行,搭建联邦学习平台;各参与方仅在本域内进行模型训练,仅交换加密后的梯度参数,最终生成联合风险控制模型,既有效提升银行对小微企业信用评估的准确性,又确保原始敏感数据“不出域、不泄露、不滥用”。试点成熟后,逐步向保险精算、供应链金融、政府补贴核查等领域推广,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审计的“数据不出域”应用案例,同步制定配套的技术标准与合规指引,为敏感数据价值挖掘提供实践经验。

三是健全数据供给保障与应急替代机制,确保关键数据服务在任何情况下“不断供、不降级”。实际工作中,部分由部委垂直

管理或央企总部提供的关键数据,可能因系统升级、接口调整、政策变化等原因出现临时中断,直接波及下游信用评价、贷款审批等核心业务。为此,必须建立“平急结合”的供给保障体系:一方面,针对税务、电力、海关等生命线数据,与供给方签订服务水平协议(SLA),明确最低可用率要求和故障恢复时限;另一方面,提前设计数据摘要、标签画像、趋势指数等替代服务方案——例如,当电力明细数据暂时无法获取时,自动切换至“企业用电稳定度等级(高/中/低)”或“近三个月用电环比变化趋势标签”,确保信用评价模型仍有基础输入。同时,建立应急触发机制,一旦监测到关键数据源异常,自动启动替代方案并同步告警

通知相关业务方和协调团队,待数据恢复后再无缝衔接。此外,还要定期组织模拟演练,验证替代数据的有效性与业务连续性,做到“平时有备、急时有序”,最大程度降低单一数据源中断对信用服务体系的冲击。

**参考文献:**

[1] 门钰璐,严宏伟,王丛虎.社会信用合作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数据开放的视角[J].行政管理改革,2022(7):75-83.  
[2] 刘瑛.信用视角下的数据安全法律规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79-93.

**责任编辑:马俊**

**(上接第 16 页)**

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人民日报,2023-10-09.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6]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5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 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N].人民日报,2025-05-08.  
[13] 习近平书信选集:第 1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14]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 2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徐书琴**

#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马俊 高洁

(合肥市委党校,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其建设成效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利于拓展治理空间、形塑协同共治的治理结构、增强共同体的黏合性。当前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着数据壁垒仍然存在、多元主体参与动能不足、技术异化问题凸显、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机制不完善等困境。针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如下优化策略:破除数据壁垒,为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激活多元主体的参与动能,培育数字治理共同体;纠治技术异化,构建以人为本的数字治理生态;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既重线上也重线下,推动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深度融合。

**[关键词]**社会治理共同体 数字技术 共建共治共享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其建设成效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sup>[1]</sup>,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升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sup>[2]</sup>这为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明确了实践方向。当前,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深刻改变生产生活与社会运行逻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嵌入城乡治理全链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6年度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科研课题“合肥促进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研究”(立项编号:HFDXKT202615)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6-05-21

作者简介:马俊,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教授。高洁,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助教。

条,为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实践可能。结合数字技术发展趋势与社会治理实践需求,深入探究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一、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

“共同体”概念源远流长,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经典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区分了基于本质意志的“共同体”与基于理性意志的“社会”,将“共同体”(Gemeinschaft)界定为一种基于本质意志(Wesenwille)形成的有机生命体,其核心内涵是指通过血缘、地缘和精神关系联结的人群组合,强调成员间的情感纽带、传统习俗与共同归属感<sup>[36]</sup>。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是对以往共同体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其明确多元主体权责分配、全民参与的制度框架,又在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学理层面看,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三个核心特征:一是价值共识性。强调治理主体间的价值认同与精神归属,治理成果的公平分配与共享机制,共同体的维系需要超越个体利益的价值共识与目标认同。二是多元主体性。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是单一主体的治理,而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三是行动协同性。共同体依托持续互动形成有机协作关系,多元主体在常态化互动中构建责任共担、协同共治的集体行动逻辑。基于上述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内涵的界定,本文构建“价值—结构—关系”三维分析框架,阐释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

#### (一) 价值维度:数字技术拓展治理空

间,重塑共同体价值共识

价值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存续的精神内核。数字技术的介入,通过需求精准匹配、包容性机制设计等,为实现多元主体利益调和,推动差异化诉求向公共价值聚合提供了新的可能。第一,数字技术拓展了价值共识的形成空间。传统社会中,价值共识的形成依赖于面对面的沟通、长期的社会互动和文化遗产,其形成过程缓慢且受限于物理空间。而数字平台则打破了时空限制,使分散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主体能够在线互动、交流观点、协商议题,个体能够在公共议题的讨论中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认同。数字公共空间的构建,为价值共识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公共领域”。第二,数字技术强化了价值共识的凝聚机制。数字技术不仅提供了沟通的渠道,更通过数据可视化、信息推送、智能匹配等功能,将抽象的治理目标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的具象信息。这种可视化不仅提升了信息的透明度,更重要的是将分散的个体认知整合为共享的集体认知,为价值共识的形成提供了认知基础。第三,数字技术赋能“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价值内涵的机制化落地。在数字时代,“人人有责”不再停留于抽象的道德呼吁,依托数字平台任务派发、积分激励、信用归集等机制,转化为清晰可落地的行为指引。“人人尽责”借助数字化过程追踪与绩效反馈机制持续强化。“人人享有”则通过精准化的公共服务供给得以实现,数字技术不再单纯作为行政管控工具,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实现的中介载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逐步形成统一的价值认知,实现共同体价值共生。

#### (二) 结构维度:数字技术消解条块壁垒,形塑协同共治的治理结构

治理共同体的协同运转离不开完备的物质与制度载体。数字技术通过打破条块分割壁垒、赋能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形成权责清晰、责任共担的协同共治格局。第一,打破信息壁垒,优化治理的横向协同结构。数字技术通过构建公共数据资源中心和管理平台,推动数据信息的统一存储与共享。数据中台通过统一数据标准、清洗和治理,打通基础数据库与各部门业务库,形成可供全域调用的数据资产<sup>[4]</sup>,使得原本离散的物理世界被映射为完整、动态、可追溯的数字图景,共同体建设就有了统一的“数据地基”。第二,优化权力配置,重塑治理的纵向互动结构。传统治理中,权力运行遵循自上而下的科层逻辑,基层群众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数字技术通过平台化治理,为基层民众的参与提供了便捷通道。一方面,数字平台使基层的问题和需求能够快速向上传递,打破了层级过滤的信息衰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使政策执行的过程更加透明、可追溯,增强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和下级对上级的反馈,形成双向互动的治理结构。

(三)关系维度:数字技术赋能主体深度联结,增强共同体黏合性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命力在于主体间的有机联结。数字平台大幅降低了治理参与门槛,重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治理主体的互动逻辑,数字技术通过加深治理主体的内在黏合,建立起有机联结,创设了融责任、信任、情感于一体的治理共同体。第一,数字技术构建责任共同体。数字平台的全程留痕、过程追踪功能,使治理过程中各主体的责任变得清晰、可追溯。谁参与了什么、贡献了什么、完成得如何,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被记录和呈现。这种透明化的责任机制,促使各主体真正承担

起应尽的治理责任。第二,数字技术构建信任共同体。信任是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核心纽带,数字技术通过提升治理透明度、优化信息对称性,为信任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撑。当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当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精准可及、当群众诉求的回应更加及时有效,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就进一步增强了。数字平台上的协商议事功能,则为不同主体之间的直接对话提供了渠道,在持续的互动中加深了相互理解与信任。第三,数字技术构建情感共同体。共同体的最高形态是情感共同体——主体之间不仅有理性的合作,更有情感的联结。数字技术看似冰冷,实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增进情感联结。数字平台降低了治理主体参与治理的门槛和成本,社区居民可以通过手机 App 参与社区事务讨论,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数字平台承接公共服务,企业可以通过数据共享参与城市治理,在日常的互动中培育治理主体归属感。数字化的积分激励、荣誉表彰等机制,通过正向强化激发主体的参与热情与集体荣誉感。数字技术不是情感的替代者,而是情感的催化剂——它通过降低互动成本、增加互动频率、丰富互动形式,使原本稀缺的情感联结变得可能和可持续。

## 二、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数据壁垒仍然存在,制约共同体底层数字支撑体系的构建

数据资源互联互通是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当前数字化治理建设过程中,部门条块分割的治理格局尚未彻底打破,数据孤岛、数据碎片化问题仍然存在,制约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第一,横向部门数据壁垒仍然存在,公安、民政、城管、应急、住建等部门数据标准不统

一、端口不兼容、归集不彻底,各类治理数据分散存储在独立业务系统中,难以实现跨部门数据实时共享。第二,纵向层级数据流转不畅,市、区(县)、街道、社区四级数据双向流动机制不完善,基层治理数据向上归集滞后,顶层研判数据向下赋能不足,难以形成全域化、动态化的治理数据闭环。

(二)多元主体参与动能不足,“人人尽责”的共同体共治格局尚未真正实现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权责共担。当前数字化治理实践中仍保留着较强的单中心行政逻辑<sup>①</sup>,多元主体参与仍然存在着渠道形式化、动力不足、权责模糊等问题,制约着“人人尽责”的共治格局的形成。第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政府统揽数字化治理工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缺乏常态化的参与。政企数字化合作多以短期项目模式开展,侧重于平台建设与技术交付,尚未建立常态化场景迭代、长效运维机制;社会组织承接数字化服务缺少稳定的资源支持与准入规范,参与空间受限,难以深度嵌入治理流程。数字化工具仅仅搭建起多元主体互动平台,却未能转化为稳定的责任联结机制。第二,居民参与容易陷入“浅层参与”困境。数字平台虽开通民意征集、线上议事等功能,但诉求吸纳、反馈回应的通道不够顺畅;部分智慧治理平台操作繁琐,群众参与体验差;老年人等低数字素养群体无法熟练使用政务小程序、民意反馈平台、智慧社区系统等,客观上被排斥在数字治理体系之外。这些都制约了“人人参与”的共同体建设目标的实现。

(三)技术异化问题凸显,数字治理偏离共同体的人本价值导向

数字技术本应作为赋能社会治理、凝聚共同体共识的工具,但实践中出现工具理

性压倒价值理性的技术异化问题,偏离了社会治理共同体以人为本、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价值。第一,数字技术的工具价值被过度放大。部分治理主体陷入唯数据论的误区,将复杂的、动态的治理过程简化为冰冷的指标考核。为了迎合算法和系统要求,基层工作者被迫将大量精力耗费在工作留痕上,各类数字化打卡、线上填报、台账上传等繁杂任务挤占基层干部本可用于实地走访、矛盾纠纷调解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异化使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服务于人的初衷。第二,算法驱动的智能治理多以标准化、量化式逻辑开展治理研判,难以适配邻里纠纷、基层矛盾、民生帮扶等柔性治理场景,容易出现“机械治理”“一刀切治理”等问题。技术理性过度扩张,消解了基层治理的温度和人文关怀,不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培育共同体归属感。

(四)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机制不完善,共同体信任基础有待夯实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是数字治理共同体健康运转的基本保障。当前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机制的不完善,正动摇共同体的信任基础。第一,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机制存在薄弱环节。数据采集、存储、共享、应用、销毁全链条监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在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归集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且严密的安全标准,数据在采集、传输、存储及使用环节面临泄露风险。第二,公民隐私权益保护机制不够健全。在数字化治理过程中,部分治理平台存在“泛采集、过度抓取”现象,对居民位置信息、生活轨迹、诉求记录等隐私数据进行无差别归集,超出公共治理必要边界。由于算法透明性不足、隐私授权机制简单化,公众难以知晓个人数据的具体用途、流转范围与使用期限,知情权与隐私权得不到有效

保障。

### 三、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优化策略

(一)破除数据壁垒,为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数据要素自由流通与高效共享是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前提。需构建全域贯通、安全合规、共建共用的数据共享体系,夯实共同体建设的技术底座。第一,健全政务数据统筹共享机制。建立统一的数据中台,对各部门治理数据实行统一归集、统一分类、标准化管理。细化跨部门数据共享权责清单,明确可共享、受限共享与涉密数据边界,摒弃选择性共享、形式化共享的低效模式。同时将数据共享成效纳入部门常态化绩效考核,以制度刚性破除部门本位主义。第二,搭建层级联动数据流通机制。打通市、区(县)、街、社四级数据通道,是破解纵向数据阻滞、实现治理资源下沉的关键举措。依托一体化数据中台,构建自上而下统筹调度与自下而上动态归集的双向数据流通体系。通过下放基础数据查询、诉求数据调取、风险数据研判权限,让街道、社区基层治理单元能够直接调取所需政务数据,减少层层申报、逐级审批带来的信息滞后问题,提升基层治理响应效率。同时,建立基层数据实时上报机制,有效打通纵向治理信息壁垒。第三,完善数据动态更新机制,提升数据共治质量。通过常态化数据清洗、质量校验与动态更新,持续优化数据质量,让数据精准匹配群众诉求、支撑智能研判、服务协同决策。通过全方位破除数据流通堵点,真正实现治理数据互联互通、共治共享,为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二)激活多元主体的参与动能,培育数字治理共同体

数字技术不仅是治理工具,更是连接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的纽带。要以技术为媒,激活多元主体,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数字治理共同体。第一,推动政府在数字治理中角色的转变。政府要从全能管控者转变为平台搭建者、规则制定者、资源统筹者,主动开放数字治理参与端口,为企业、社会组织等搭建常态化数字化参与渠道,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风险排查、民意收集、矛盾纠纷调解等事务。第二,制度化赋能市场主体深度参与治理。政府依托数字治理场景开放机制,持续开放基层治理、民生服务、风险防控等应用场景,引导企业发挥算法、算力与技术研发优势,参与平台升级、模型优化与智能运维。同时通过完善政企合作权责清单、数据合规机制与利益共享规则,厘清技术服务与公共治理边界,规避资本无序渗透风险,让市场主体成为数字化治理的稳定支撑力量。第三,弥合数字参与鸿沟。优化智慧治理平台界面功能,简化操作流程,开设适老化、简易化服务模块,同时依托社区课堂、网格员帮扶、志愿者指导等方式提升民众数字素养,保障数字弱势群体的治理参与权,实现治理参与全覆盖。提升数字化平台互动性、服务性与实效性,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健全数字人才培育体系,常态化开展大数据应用、平台运维、智能研判、数字治理能力培训,培育专业化、复合型数字治理人才,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为社会治理共同体长效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三)纠治技术异化,构建以人为本的数字治理生态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让数字技术回归治理本源、服务共同体建设。第一,摒弃技术工具主义思维。立

足基层真实治理需求整合数字化平台与智能设备,淘汰闲置低效系统,聚焦民生服务、风险防控、矛盾化解等核心场景优化平台功能,实现数字平台与治理需求精准匹配。推行柔性化、人性化算法治理,在智能研判、风险派单、基层管控中加入人工复核、人文兜底机制,兼顾算法效率与基层实际,避免机械治理、生硬治理,提升群众在数字化治理中的获得感与共同体认同感。第二,建立技术应用的伦理审查与容错纠偏机制。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应用日新月异,其潜在风险往往事后才暴露。应设立由法律专家、技术专家、伦理学者和公众代表组成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对重大数字治理项目进行前置伦理评估与持续跟踪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异化苗头,避免“先上车后补票”式的风险扩散。第三,减轻基层数字化留痕负担。统筹整合各类治理信息平台,统一数据采集口径,建立基层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共享”机制,清理非必要打卡上报、冗余台账等任务,将基层干部从繁杂的线上事务中解放出来,以减负增效筑牢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层基础。

#### (四)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加强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需要以健全的制度、规则约束主体治理行为、规避技术治理风险,让数据在安全有序的轨道上流动。第一,构建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制度。立足数据采集、存储、共享、应用、销毁全流程,细化数据分级分类管理规范,明确政务数据、社会数据、民生敏感数据的使用边界与管控标准。建立常态化数据安全审查、风险排查与动态溯源机制,严格规范政府部门、第三方技术企业的数据访问权限,杜绝超范围采集、违规调取、随意流转数据等问题,通过严密的制度来

防控数据泄露、滥用等风险。第二,健全公众隐私权益保护机制。优化数字治理场景中的个人信息授权机制,简化隐私告知流程,保障群众对个人数据使用范围、流转路径、应用场景的知情权与选择权。针对基层治理中过度数字化、泛化采集隐私信息等问题,划定数据采集负面清单,严禁超出公共治理必要范畴抓取居民隐私数据,消解数字治理带来的隐私侵害风险。第三,建立数据安全违规惩戒机制。明确各类主体数据权责边界,针对违规采集、擅自流转、泄露居民隐私等行为落实追责惩戒。积极吸纳社会公众、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监督,打造多元协同的数据安全监管格局。通过构建常态化、规范化的制度约束体系,统筹数据开发利用与隐私安全保护,持续规范数字治理各类主体行为,为数字治理共同体长效、安全、有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 (五)既重线上也重线下,推动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深度融合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不能脱离物理空间而完全虚拟化。数字空间提供了新的治理场域和互动方式,但物理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文化传统、情感纽带等仍然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数字赋能的关键不在于用数字空间替代物理空间,而在于推动二者的深度融合。第一,坚持“线上+线下”的融合模式。依托线上平台完成诉求归集、智能研判、流程监管等数字化工作,发挥技术高效便捷的治理优势,同时常态化开展线下入户走访、群众议事、实地调研等工作,让传统治理方式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粘合剂”作用。完善“线上受理研判、线下处置落实、线上反馈评价”机制,线上平台负责信息的快速集散与精准分发,线下渠道侧重于情感的深度沟通与矛盾的实质化解,(下转第 64 页)

# 列宁对涉民族问题错误思潮的批判 及其现实启示

魏咏琪 王永贵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围绕民族问题出现了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文化自治”、联邦制原则、“狭隘恐惧论”等错误思潮,严重阻碍了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列宁对这些错误思潮进行了系统批判,深刻阐发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平等的辩证统一、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辩证统一、建立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尊重历史规律并促进民族融合等重要原则。列宁的批判为新时代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镜鉴:坚决抵制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潮,倡导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通过巩固文化主体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关键词]**列宁 民族问题 批判 错误思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问题是关系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围绕民族问题出现了多种错误思潮,不仅造成思想混乱,更严重干扰了革命实践。为廓清思想迷雾,列宁通过对这些错误思潮的深入批判,系统阐发了无产阶级政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新时代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sup>[1][32]</sup>在此背景下,重温列宁对民族问题错误思潮的批判,汲取其中的理论智慧,对于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实践路径研究”(立项编号:24&WZD18)。

收稿日期:2026-05-20

作者简介:魏咏琪,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永贵,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批判民族沙文主义,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团结与民族平等原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多数领袖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打着“保卫祖国”的幌子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政策,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作为“各族人民的牢狱”<sup>[285]</sup>,其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严重威胁着民族团结。沙文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极端化形态,它通过煽动本民族优越论与排外仇恨,将民族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上,对内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外进行扩张掠夺。从表现形式看,民族沙文主义对外表现为社会沙文主义,对内表现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二者实质都是利用民族外壳掩盖阶级压迫,瓦解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联合。列宁对此展开系统批判,旨在揭露其欺骗性,唤醒广大工人及被压迫民族摆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桎梏,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实现真正的联合,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奠定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对外方面,列宁批判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针对第二国际领袖打着“保卫祖国”的幌子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战的行径,列宁首先从战争性质入手予以揭露。他强调,判断战争性质的标准“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是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场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sup>[3288]</sup>。以此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认为参战双方进行的都是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支持此类战争实质上是为帝国主义政策辩护。社会沙文主义者接受资产阶级的“防御”口号,抛弃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基本原则,掩盖了

战争的非正义本质。因此,列宁指出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向群众揭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戳穿“护国主义”的欺骗性。他重申“工人没有祖国”<sup>[4419]</sup>的国际主义立场,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各国无产阶级利益根本一致。社会沙文主义以抽象的资产阶级民族利益取代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煽动民族仇恨,瓦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阵线。为此,列宁提出“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sup>[518]</sup>的口号,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将枪口转向本国资产阶级,利用战争引发的资产阶级统治危机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列宁进一步揭示,社会沙文主义并非战争时期的偶然现象,而是战前改良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sup>[5261]</sup>。他强调,在实践中必须与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团结各国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建立共产国际,使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挥中心。

在对内方面,列宁批判奴役弱小民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其一,他揭露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以抽象的“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掩盖阶级压迫的实质,让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农民保卫本民族剥削阶级的特权。列宁提出必须坚持民族自决权,直至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能为真正平等基础上的自愿联合扫清道路。其二,列宁批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俄国工人内部制造民族优越感,离间他们与被压迫民族工人,破坏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为此,他提出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承担起反对本民族沙文主义的历史责任,要求在法律与制度层面确立各民族的平等权,废除一切民族特权,以重建无产阶级的阶级信任。其三,列宁强调社会主义联盟必须以民

族平等和自愿为前提,任何以民族特权和大俄罗斯官僚集权为基础的联合都必然复制民族压迫关系,无法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联盟。他将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确立为党的首要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补偿性原则:“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sup>[6]356</sup>,即在联盟体制中对历史上受压迫民族给予特殊照顾与补偿,以建立真正自愿平等的国家联盟。其四,列宁严格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对压迫民族的侵略性民族主义如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必须坚决斗争;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则应承认其历史正当性,通过支持其平等权利与自决诉求,将其引导至共同反对阶级敌人的国际主义轨道上来。

## 二、批判“民族文化自治”的“超阶级文化论”,强调发展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文化

“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兴起于19世纪末的奥匈帝国,由鲍威尔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为应对帝国复杂的民族问题而提出,其核心主张是各民族成员不分地域组成文化共同体,自行管理文化教育等事务。这一思潮在第二国际内影响日增,传入俄国后,在犹太工人联盟等组织中产生影响,成为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相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民族文化自治”思潮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影响日增,成为民族纲领的关键论争。列宁批判其将民族问题狭隘化为文化问题,以超阶级的“全民族文化”幻想掩盖阶级对立,实质是分化无产阶级团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他指出:“‘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损的民族主义,就是用民族文化这一口号来腐蚀工人。”<sup>[7]239</sup>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两种文化”

理论,主张从各民族文化中萃取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成分,使各民族劳动者在共同斗争中“打成一片”,将民族问题纳入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体框架。

第一,揭露“超阶级文化论”的虚幻性,提出“两种文化”理论。针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将民族共同体抽象化为超阶级文化共同体的倾向,列宁指出,在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阶级社会里,绝不存在超阶级的全民族文化,这也是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长期争论的回应。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提议将设立保障民族文化发展机关的要求载入党纲,被大会一致否决。列宁后来回忆,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坚决反对,正是因为“建立机关”实质上就是“民族文化自治”的翻版。十年后,崩得分子李普曼仍在《时报》上攻击列宁的立场,宣扬工人不应漠视本民族文化及其发展。正是这一持续的理论交锋,促使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提出“两种文化”理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sup>[7]125-126</sup>。这一论述揭示了民族文化的复杂构成:既包含被剥削劳动群众创造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也包含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因此,笼统地提民族文化,不仅含混不清,还会模糊阶级鸿沟。“民族文化自治”口号的欺骗性在于,它要求无产阶级接受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作为全民族的文化,从而放弃对本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使工人沦为资产阶级民族主

义的俘虏。“两种文化”理论所揭示的文化的阶级性,彻底粉碎了“民族文化自治”所依赖的超阶级文化幻象。

第二,批判将民族问题“文化化”的空想性,强调民族问题的政治属性。列宁指出,“民族文化自治”将民族问题狭隘化为文化问题,实质是回避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解决土地问题这一根本政治任务。民族问题不能脱离政治经济基础孤立解决,空谈文化自治是典型的改良主义。有学者指出,鲍威尔企图通过“民族文化自治”和议会民主解决奥匈帝国的民族矛盾,最终沦为“徒劳的机会主义路线”<sup>[8]</sup>。这种改良主义的危害在党内日渐显现,崩得不仅在理论上鼓吹“民族文化自治”,还在组织上搞分离主义。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长期同情崩得,但在1913年夏季会议上开始质疑其纲领。列宁敏锐指出,这一转变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与崩得搞分离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脱离政治的文化自治必然导向组织分裂。他以瑞士为例指出:在实现了民族平等和彻底民主制的条件下,“民族文化自治”是多余的;反之,它就是空想,就是精致的民族主义宣传。因此,不实现土地革命、不推翻专制制度、不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文化自治”不仅无法保护弱小民族文化,反而会因维护旧制度而阻碍民族解放。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阶级压迫,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铲除这一根源。因此,列宁指出:“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sup>[9]268</sup>。这里的“从属”并非轻视民族问题,而是强调其根本解决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前提。离开这一前提的文化自治,只是用琐碎的文化立法转移群众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实质是帮助统治阶级维护旧制

度。通过对“民族文化自治”空想性的批判,列宁将民族问题从文化改良拉回到政治革命轨道,确立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根本出路、以政治民主化为制度保障的基本原则。

第三,批判其分裂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实质,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高于民族界限。“民族文化自治”主张按民族划分学校、组建政党,列宁认为这是对工人运动的瓦解。如果每个民族的工人都只关注本民族的文化事务,势必导致无产阶级在组织上的分裂。1903年,崩得因联邦制建党要求被否决而退出党的代表大会,首次表现出组织分离倾向;1914年,当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面临分裂时,它进一步在政治上倒向取消派。列宁在《问题明确了》中指出,崩得不仅公开赞扬齐赫泽等取消派代表的分裂行为,而且在面对是否承认1908年反取消主义决议的质询时,与取消派一同沉默、回避。这表明崩得已从组织分离发展为与取消派合流,彻底倒向放弃革命、破坏统一的立场。面对用民族文化口号分裂工人的威胁,列宁从三个层面予以回应。在法律层面,他提出“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明确规定任何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均属非法无效,以具体的民主权利击碎“文化自治”的虚幻承诺。在组织层面,他坚决反对按民族建立工会或党组织,要求在一切实工人组织中“各民族的工人无条件地统一,并且完全打成一片”<sup>[7]24</sup>。在文化层面,列宁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sup>[7]25</sup>,阐明这种共同文化并非超越各民族文化之上的抽象存在,而是从每个民族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以对抗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民族主义。它旨在综合、融合各

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促进工人运动发展,而绝不否定或取代各民族的文化。各民族无产阶级只有在这种共同文化的引领下,才能从本民族资产阶级文化中解放出来,联合成统一的国际力量。

### 三、批判国家结构形式上的联邦制原则,强调以建立多民族统一的单一制国家为最终目标

列宁对联邦制原则的批判,最早集中于政党组织层面。当时崩得分子主张在党内实行联邦制,要求按民族划分党组织,割裂工人阶级的统一斗争力量。列宁所批判的联邦制原则,本质上是以分权割裂为特征、违背集中统一要求、易导向分裂的原则。在国家结构层面,其表现为以民族或区域为单位划分国家权力,各成员拥有相对独立的主权与治理权,使国家整体呈现松散的结构形态,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权与市场,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驰。

十月革命前,列宁始终反对联邦制,主张建立“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sup>[10]68</sup>。具体而言:其一,在理论根基上,列宁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总结欧洲革命经验时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恩格斯更将联邦制视为一种倒退。列宁继承这一立场,认为联邦制本质上体现着小资产阶级的分散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其制度性分权会固化民族间的政治壁垒,妨碍无产阶级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他在1913年致邵武勉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们无条件地拥护民主集中制。我们反对联邦制”<sup>[11]387</sup>,并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强调“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sup>[7]148</sup>。其二,从经

济与阶级角度,列宁批判联邦制会削弱经济联系、瓦解无产阶级团结,指出集中制是历史进步与阶级斗争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必然打破地方与民族的封闭状态,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实现资源、劳动力和商品的自由流通。因此,“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sup>[7]148</sup>。联邦制可能带来的市场分割与制度壁垒,恰恰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从阶级斗争看,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超越民族界限的联合,资产阶级则常利用民族主义分化工人运动,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有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领导体制,将各民族工人凝聚起来,形成强大力量。列宁由此得出结论:“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大国比小国能有效得多地完成促使经济进步的任务,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任务。”<sup>[9]72</sup>其三,从民主自由层面,列宁批判联邦制限制真正的民主,指出,“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sup>[10]70</sup>这是因为,在民主集中制框架内,可广泛实行地方自治与区域自治,保障各民族在文化、经济等事务上的自主管理,而无须分割国家主权。相比之下,联邦制通过宪法将权力在中央与成员单位间进行固定分配,可能固化各民族在政治上的界限,使民族问题演变为持续不断的权限争端。因此,民主集中制才是实现真正民主的更优形式。

十月革命后,面对原沙俄境内60多个民族政权相继独立、国家四分五裂的严峻现实,以及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干涉,列宁调整了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主张。他清醒地认识到,若僵化坚持革命前的单一制理论,无异于将非俄罗斯民族推向敌对阵营,危及革命全局。因此,列宁将联邦制

视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团结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政治形式,其目的是通过各民族更易接受的组织形式,将其保留在苏维埃国家体系内,为日后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更紧密联合创造条件。这一转向体现了列宁将革命原则的坚定性与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政治智慧。列宁对联邦制的接纳始终是策略性的、有条件的,其限度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性质上,列宁仅将联邦制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采用的过渡形式,而非理想的国家结构形式。他反复申明,联邦制“只要它是以真正需要某种程度的国家独立性的重大的民族差别为基础,那么它同民主集中制也丝毫不抵触”,其价值在于“使俄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sup>[12][39]</sup>。其二,立场上,列宁从未放弃对联邦制原则本身的否定,严格区分作为原则的联邦制与作为手段的联邦制。十月革命前他批判的是作为原则的联邦制;革命后接纳的是作为手段的联邦制,即特定条件下不得已的过渡安排。他从未将联邦制作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理想模式。其三,目标上,列宁从未动摇建立“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最终追求。1919年俄共(布)八大党纲明确将联邦制定位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sup>[13][473]</sup>。列宁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是“普遍的‘正常的’国家的类型”<sup>[14][469]</sup>,联邦制只是走向这一目标的阶段性安排。

列宁始终坚持以建立多民族统一的单一制国家为最终目标。在1917年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中,他重申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sup>[15][295]</sup>。这一论断是列宁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

深刻分析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要求打破地域和民族的壁垒,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sup>[7][149]</sup>。对于肩负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而言,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不仅有利于组织全国性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列宁晚年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揭示了联邦制的潜在危险。面对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列宁愤慨地指出,所谓的统一机关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的,只是涂了点苏维埃色彩。这不仅有复活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风险,还可能使联邦制成为固化民族分离的温床。因此,他主张限制中央权力,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联盟,恢复各共和国在其他方面的独立,旨在防止联邦制蜕变为民族压迫的外壳,确保联合真正自愿平等,为最终走向单一制创造条件。

#### 四、批判民族融合趋势中的“狭隘恐惧论”,强调在完全平等基础上促进民族接近是历史的进步方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了民族隔绝,促进了民族间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使民族接近成为历史必然。然而,沙皇俄国奉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非俄罗斯民族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这种压迫性的强制同化不仅未能促成民族融合,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在被压迫民族中催生一种“狭隘恐惧论”。该思潮将对强制同化的反抗错误地延伸到抗拒自然同化,试图以法律手段固化民族差异。鲍威尔等人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便是这种错误思潮的理论体现。这一思潮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强制同化与自然同化,盲

目排斥一切民族接近的倾向,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从历史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要求出发,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

第一,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格区分强制同化与自然同化。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专设“民族主义的吓人字眼——‘同化’”<sup>[7]128</sup>一节,集中驳斥崩得分子对“同化”的误解,指出必须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同化:一种是基于特权的强制同化,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自然同化。后者作为客观的历史进程,具有进步意义。列宁指出:“谁没有陷进民族主义偏见,谁就不会不把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看做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看做是对各个偏僻角落的民族保守状态的破坏”<sup>[7]132</sup>。他批判崩得分子李普曼等人将各民族工人在统一组织中联合的主张污蔑为“同化的陈词滥调”<sup>[7]129</sup>,揭露其抗拒历史进步的实质。列宁以美国移民融合、俄罗斯与乌克兰无产阶级的联合实践为例,证明自然同化正在消解民族狭隘性,为阶级联合奠定基础。他尤其批判“民族文化自治”试图通过立法手段将民族固化为封闭的文化共同体,指出这只会阻碍各民族无产阶级在平等基础上的革命联合。

第二,坚持物质第一性原理,揭示民族接近与融合的经济必然性。列宁将民族问题置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中加以考察,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式,这是其二”<sup>[7]129</sup>。狭隘恐惧论的错误在于固守第一种趋势而忽视甚至抗拒第二种

更具根本性的趋势。列宁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指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扩展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必然促使生活在同一国家或经济区域内的各民族,为适应共同的经济生活而自发选择一种最便于沟通的语言,形成更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这种由经济需要催生的自然接近,远比依靠行政命令推行的强制同化政策更为深刻和文明。因此,抗拒这一客观趋势不仅是徒劳的,更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倒退立场。

第三,坚持矛盾分析法,辩证把握民族自决与民族融合的内在关联。列宁创造性地运用“离婚权”阐释民族自决权的内涵:正如承认离婚自由并不会导致家庭解体,反而能使婚姻关系在民主基础上更加稳固一样,在民族问题上,“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愈接近充分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sup>[2]257</sup>。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主张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承认大国在经济上的发展优势,但这种联合必须建立在各民族完全自愿的基础之上。他强调:“我们要求民族有自决的自由……是因为我们想建立大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sup>[2]85</sup>换言之,彻底的分离权是实现自愿联合的唯一担保。只有真正赋予并保障各民族分离权利,才能消除因历史压迫造成的不信任与戒备,从而为各民族在完全平等基础上实现自由联合开辟道路。这种将承认分离权作为自愿联合之前提的辩证思维,使列宁对“狭隘恐惧论”的批判具有深刻的理论穿透力。

## 五、列宁在涉民族问题上批判错误思潮的现实启示

通过对错误思潮的深刻批判,列宁系统

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与政策主张,也为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温列宁的论述,对我们在新时代把握民族工作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抵制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潮,倡导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面对俄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列宁深刻批判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坚决反对一切民族特权与压迫,主张在完全平等基础上实现各民族联合。同样作为多民族国家,这一立场对中国处理民族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意识形态的安全形势发生深刻的新变化。”<sup>[16]155</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高度的忧患意识强调“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sup>[17]248</sup>。具体而言,一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涉民族问题的错误思潮。这既包括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包括因地区发展差异、文化认同等问题可能引发的地方民族主义,二者本质上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二是在破除民族主义思想障碍的基础上,倡导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以平等为前提,以团结为目标,以互助为路径,以和谐为状态。这既是对列宁民族平等原则的继承,也是基于中国国情与时代要求的创新性发展。

第二,巩固文化主体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列宁批判“民族文化自治”纲领以民族利益掩盖阶级矛盾、以文化自治之名行文化隔离之实,从而瓦解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基础。针对这一错误纲领,列

宁主张发展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文化,使各民族无产阶级在共同斗争中形成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化认同。在当代中国,这一文化认同具体表现为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不是各民族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与升华,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共同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18]157</sup>因此,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将各民族文化对立、割裂的错误观念,在尊重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着力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牢固树立“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sup>[17]246</sup>的鲜明导向,最终将这种文化认同内化为全体人民的内在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三,坚持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列宁对联邦制原则的批判,揭示了手段与目的的辩证关系,联邦制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走向统一的过渡形式,而非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理想形态,真正的目的是建立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的多民族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这一论述立足于俄国各民族尚未形成稳固国家共同体的现实,解决的是“如何实现联合”的问题。当代中国已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问题已转化为“如何巩固和发展已有联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sup>[17]246</sup>。列宁关于过渡形式服务于最终目标的辩证思想,为我们处理民族关系中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必须坚持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不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在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尊重和包容各民族在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同时坚决反对任何以尊重差异性为借口企图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始终在增进共同性中尊重差异性,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大局。

第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列宁在批判“狭隘恐惧论”时深刻指出,经济发展是民族融合的内在动力,各民族因经济联系而自然接近、走向融合,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进步方向,任何对这一趋势的拒斥本质上都是对历史规律的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7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发展进步。”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一方面,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不断缩小差距中夯实民族平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拓宽了各民族的交往范围,使其在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自然走近。最终,使各族人民在共建共享中实现繁荣发展,在深度融合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17.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7] 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8] 王幸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及其局限——兼谈列宁、斯大林对鲍威尔民族理论的批判[J].贵州民族研究,2023(1):60-66.
- [9] 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 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1] 列宁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3] 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4] 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 王永贵.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8]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马俊

# 《怎么办?》中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生成理路、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种永恒 夏玉元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怎么办?》是列宁阐述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奠基性文献。面对帝国主义时代俄国专制统治、党内思想混乱与组织涣散的严峻现实,列宁科学回答了在专制制度下如何锻造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命题,形成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这一思想体系以清算“经济派”崇拜自发性、鼓吹“批评自由”的思想谬误为逻辑起点,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确证理论先导地位,强调以职业革命家为骨干锻造党集中统一的组织形态,明确了以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为导向“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作方法,不仅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服涣散状态、加快布尔什维克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怎么办?》中的党建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强化理论武装、抵制错误思潮、健全组织体系等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怎么办?》 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时代价值

《怎么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以下简称《怎么办?》)是列宁阐述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奠基性文献。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内部右倾机会主义迅速抬头,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系统提出修正主义理论,打着“批评自由”的旗号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潮蔓延至俄国,逐渐催生了以“经济

派”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在思想上否认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在组织上否认建立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策略上满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引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与组织危机。列宁通过批判“经济派”错误主张,科学回答了在专制制度下如何锻造集中统一、富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基金项目: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25 年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AI 大模型驱动下高职思政课教师劳动‘异化’的风险生成机理与治理研究”(立项编号:2025SZX388)。

收稿日期:2026-05-22

作者简介:种永恒,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夏玉元,甘肃定西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时代命题,形成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当前,时代条件虽然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列宁在《怎么办?》中批判的“忽视思想理论建设”的现象并没有消失,列宁关于党的理论自觉、组织体系建设等的重要思想仍然没有过时。

### 一、《怎么办?》中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生成理路

#### (一) 帝国主义时代俄国革命危机与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

从世情看,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加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垄断组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占据支配地位,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对外扩张的主导方式。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跨国垄断组织、殖民扩张和资本输出,将触角伸向全球各个角落,既加剧了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也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分裂,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正蓄积着发动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的巨大能量。同时,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催生了反抗力量的组织化与国际化,世界愈发分化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被压迫民族日益觉醒,成长为反抗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

从国情看,最新的帝国主义特征在俄国已然显现。经济上,垄断资本主义与俄国封建农奴制结合在一起,农业经济仍占优势地位;政治上依靠军事手段巩固统治地位,对外严重依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但是总的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还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sup>[132]</sup>这个特点决定了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既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沙皇专制制度的矛盾,也有各民族同俄罗斯民族的矛盾,还有被

压迫民族同俄国帝国主义的矛盾、俄国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俄国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革命前夜,帝国主义的持续扩张与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成熟,在俄国发生了历史交汇,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客观上迫切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从党情看,革命条件的成熟与党的主观力量的严重不足形成巨大落差。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告成立,但党在思想上没有统一的理论纲领,在组织上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在行动上没有统一的斗争策略,列宁认为这种“手工业方式”<sup>[135]</sup>使革命者根本“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基础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的。”<sup>[139]</sup>更严重的是,“经济派”借助《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加紧宣扬机会主义,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革命理论指导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使党在事实上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功能。建党的初心与残酷的现实形成巨大落差,分散的组织形态难以对抗专制国家机器,错误思潮的泛滥不断消解革命力量……正是在直面这一系列严峻考验的过程中,列宁开始反思如何在一个没有议会民主传统、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 (二) 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乃至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对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进行了集中阐述。”<sup>[14]</sup>他们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强调“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

分”<sup>[44]</sup>，明确了唯物史观是党的理论基础，制定了“消灭私有制”的最低纲领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确立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sup>[42]</sup>的国际主义原则。《宣言》还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自我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成为各国工人阶级建党的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

1848年欧洲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第一次实践检验，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经验教训，将建党学说从初步建构推向纵深发展。他们认为，分散的组织形态无法对抗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必须“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sup>[4193]</sup>，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马克思论证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并阐明了争取农民作为革命同盟军的战略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把农民发动起来，“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sup>[4573]</sup>，这一论断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重要指导。至此，党的组织形态理论、国家理论和同盟军策略理论构成了建党学说的整体框架。

1864年第一国际的创建，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从理论走向大规模革命实践。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强调，无产阶级“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sup>[51228]</sup>在领导第一国际反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捍卫了党的独立性和集中统一原则。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恩格斯深刻总结

了“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sup>[6375]</sup>的沉痛教训，阐明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并提出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独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构想。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独立的政党，推动了第二国际的成立。恩格斯晚年还提出了丰富党内民主、绝不能放弃暴力革命等重要思想，有力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 （三）列宁领导创建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创造性探索

《火星报》的创办，是列宁摆脱建党困境的第一个重大实践。面对党内无统一舆论阵地、各地方小组各自为政的涣散局面，列宁主导创办了全俄政治机关报，即《火星报》。他明确提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sup>[2156]</sup>。通过《火星报》，列宁一方面在全党范围内廓清了思想迷雾，另一方面逐步构建起一张覆盖全国的秘密组织网络。办报实践让列宁明确了两个认识：其一，思想统一是组织统一的前提，没有共同的理论纲领，组织建设就无从谈起；其二，在专制条件下，党必须依靠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革命家来领导革命活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列宁将思想自觉转化为制度规范的关键节点。大会围绕党员资格条款、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等展开激烈争论，列宁与马尔托夫发生了根本分歧，马尔托夫主张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列宁则坚持党员必须“亲自参

加党的一个组织。”<sup>[71]</sup>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建党路线的根本对立,是建立一个有严格纪律、集中统一的革命家组织,还是建立一个组织松散、各行其是的群众性团体?这种分歧的根子在《火星报》时期已经埋下,列宁在办报实践中已经深刻认识到手工业方式的致命缺陷,二大不过是将这些认识上升为制度设计层面的一次正面交锋。虽然党的二大未能实现真正的组织统一,但它第一次将集中制建党原则写入党的章程草案,初步明确了党的组织边界和纪律要求。

布尔什维克是列宁直接领导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党的二大后,党内因路线分歧,逐步形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大派别。孟什维克承袭“经济派”思想,奉行组织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改良主义,弱化革命理论灌输,轻视职业革命家组织的作用,迁就资产阶级自由派。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深化了对建党规律的认识,即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绝非自发形成的工人联合体,而是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引、以“职业革命家组织”为骨干、以集中制为组织原则、以思想建党引领组织建党的自觉型政党。布尔什维克的形成,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坚守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拒斥自发性崇拜的政治觉醒,这是俄国建党探索的重大成果。

## 二、《怎么办?》中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核心要义

(一)批判“经济派”鼓吹“批评自由”的实质与危害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应当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sup>[81]</sup><sup>[21]</sup>的道路,声称“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依赖任何理论”<sup>[92]</sup><sup>[25]</sup>,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sup>[84]</sup><sup>[2]</sup>的口号,全面贬低革命理论的指导价

值。“经济派”全盘吸收其改良主义理论内核,打着“批评自由”的旗号背离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思想上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主张科学社会主义意识能够从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中自然产生,从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理论武装地位;政治上将工人阶级的斗争局限于经济领域,反对工人阶级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放弃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与革命领导权;组织上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片面夸大工人自发经济组织的作用,将其“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sup>[21]</sup><sup>[20]</sup>

列宁率先对“批评自由”的错误倾向展开批判,揭露其机会主义本质,明确指出“‘批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sup>[28]</sup>“经济派”这种“批评”巧妙利用“自由”的幌子,绝非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的理论完善与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系统消解,从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其实质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列宁严格划清了两种批评的界限,党不反对党纲范围内必要的理论探讨,但坚决抵制以“批评”为名颠覆党的基本纲领、消解党的革命属性。

在此基础上,列宁分析了这一思潮的严重危害。其一,瓦解党内思想统一。机会主义论调会为各类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打开渗透通道,消解党的理论基础,使党沦为观点分散的松散集合体。其二,加剧组织涣散,消解党的战斗力。理论上的自发性崇拜必然衍生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使党无法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其三,偏离革命政治方向,葬送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的否定,本质上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放弃,最终会滑向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泥沼,将无产阶级政党改造为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彻底背离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目标。

## (二) 阐释革命理论对革命政党与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

在一切阶级社会,任何理论都必然承载特定的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深度内嵌于基本立场、基本原则之中,实现了科学性与阶级性的内在统一。这一理论特质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无产阶级政党,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但是“经济派”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内外呼应,醉心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致使俄国社会民主党陷入长期思想混乱。对此,列宁提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三项任务:强化党的理论工作、系统批判修正主义与“经济派”思潮、驳斥机会主义对革命纲领的消解,在论战中极大凸显了科学理论对于党的建设的核心价值。

列宁在《怎么办?》中专门引证了恩格斯关于三种斗争形式的论断,结合俄国革命实际对其做出创造性发展。列宁认为,在西欧议会民主环境中,理论斗争更多是对政治、经济斗争的补充,而在沙皇实行专制统治、党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俄国,理论斗争已经成为决定运动方向的先导性、基础性斗争,不首先在思想战线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界限,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就会滑向改良主义的泥潭。由此,列宁将理论建设提升至关乎政党性质的高度,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sup>[122]</sup>、“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sup>[124]</sup>列宁创造性地将理论自觉上升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

规定,为党的纲领统一、策略一致与组织整合奠定了思想基础。

列宁特别强调:“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sup>[123]</sup>其一,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尚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有完成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清算,理论根基远未稳固;其二,作为后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俄国必须批判地借鉴别国经验而不能停留在对他国经验的一般性模仿上,没有独立的理论探索,便无法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其三,俄国革命者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把人民大众从沙皇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这一任务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尚无先例可循。这三重现实因素决定了理论问题在俄国建党语境中,绝非一般性斗争形式选择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性质与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 (三) 建立起具有力量、稳固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sup>[121-112]</sup>在沙皇专制制度下,敌人掌握全部国家暴力机器,若将革命组织等同于自发分散的工人互助团体、否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只会让革命家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sup>[1296]</sup>,根本无法承担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列宁由此确立了党的建设的核心原则,即党的组织形态必须与它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相匹配,党不能是松散的经济组织联合体,必须是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力量的集中统一组织。这一组织既能凝聚战斗力量、保障秘密环境下的生存稳固性,也能依托稳定核心骨干实现革命传统与斗争经验的接续传承。列宁将建立

此类组织确定为“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sup>[2100]</sup>,从而把组织建设从一般策略问题提升至关乎革命成败的新高度。

列宁阐明了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本质规定。他认为党所需要的是“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sup>[2195]</sup>这一组织由经过专门训练、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的先进分子组成,成员熟悉秘密工作方法、深谙阶级斗争规律,兼具坚定意志与牺牲精神。针对“经济派”混淆组织边界的错误,列宁划清党与工会等群众组织的原则界限,指出职业革命家组织是党的领导枢纽,而工人储金会、工会等经济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外围基础,二者绝不能混同。这一区分为党的先进性提供了组织层面的清晰界线,它不再是单纯的理论宣示,而是具体化为党与群众组织在功能定位、组织标准和行动纪律上的区别。

在此基础上,列宁确立了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他认为在专制制度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sup>[2132]</sup>实行民主制所必需的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在秘密条件下完全不具备现实可能性。集中制绝非主观的组织设计,而是秘密状态下保证党组织生存、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核心是实现全党统一纲领、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列宁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适应专制条件下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党的建设新路,标志着列宁在组织建设领域对第二国际党的建设模式的根本性突破。

(四) 强调党主动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

列宁首先论证了工人运动无法自发生

成社会主义意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源于具体生产场景和局部经济诉求,经验始终局限于薪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无法上升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列宁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sup>[2129]</sup>。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科学总结,它本身无法从工人的日常斗争中自然孕育,只能“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sup>[2129]</sup>。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与工人运动无关,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对工人运动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与高度概括,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并具备很高的知识水平的学者,才具备创立这一理论的条件。

由此,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其一,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任务,单靠少数先进知识分子远远不够,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最革命、最彻底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意识必须进入工人群众的思想深处。其二,工人阶级只有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认清剥削根源、明确解放路径,实现从自发斗争向自觉革命的转变。其三,“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sup>[2138]</sup>。由此,列宁揭示了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与斗争规律。在本体论层面,强调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超阶级、“中立”的意识形态;在认识论层面,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存在可调和的中间道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sup>[2138]</sup>在实践论层面,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武装工人运动,

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列宁所主张的“灌输”,本质是遵循工人阶级意识生成规律的阶级教育,具有科学方法论原则。其一,坚持扎根实践的原则,通过政治揭露将具体的工厂剥削个案与专制制度的整体压迫相关联,引导工人从切身经验中理解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跃升。其二,坚持启发自觉的原则,遵循教育与启发的逻辑,通过揭示阶级压迫的制度根源、阐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帮助工人完成思想跃升,从自发反抗者成长为自觉革命者。其三,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依托全俄政治机关报、秘密革命小组等多元载体,以持续深入的思想工作,引导工人阶级走向政治自觉。

### 三、《怎么办?》中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 抵制错误思潮是维护党内思想统一的必要前提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思想统一从来都不是自然形成的结果,而是在与错误思潮的持续斗争中得以实现的。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sup>[10]</sup>列宁强调:“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sup>[12]</sup>,进而揭示了错误思潮对党最大的危害在于它动摇了党的理论根基。因此,抵制错误思潮绝非可有可无的思想斗争,而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凝聚全党思想共识的前置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

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sup>[11]</sup>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暗流涌动,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思潮的底层逻辑与“经济派”的“批评自由”高度同源,目的就是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列宁所揭示的“思想阵地不存在真空”原理,为研判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供了理论指导。“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sup>[12]</sup>,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sup>[13]</sup>,精准回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筑牢党的思想根基的问题。

列宁同“经济派”的论战塑造了以理论彻底性战胜思想混乱的斗争范式。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sup>[45]</sup>列宁运用这个理论武器对机会主义进行批判,从哲学基础、政治立场、组织原则等多个维度剖析“经济派”崇拜自发性的理论谬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校要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不当旁观者,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守护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前沿阵地。”<sup>[14]</sup>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践,正是这一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例如,依托史料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立足政治经济学揭露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分特殊道路与人类共同价值破除“普世价值”迷思……这套以学理辨析为抓手的理论斗争方法,是列宁建党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为筑牢党内思想防线提供了理论武器。

(二) 强化理论武装是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的本质要求

列宁在《怎么办?》中将理论自觉界定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规定。他认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揭示了先进理论对于革命事业的本体性意义,即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并不是由其阶级成分自动赋予的,而是由它所掌握的科学理论规定的。工人运动仅凭自发实践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无法自觉认知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与解放规律。唯有通过持续的理论“灌输”与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才能真正把握革命运动的条件、进程与发展趋势,确立自身先锋队定位。由此,列宁确立了一条根本原则:理论武装并非党建附属任务,而是党之所以成为先锋队的本质规定,放弃了理论武装,党就丧失了先锋队的根本属性。

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对中国共产党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置于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sup>[15][92]</sup>。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sup>[16]</sup>这一论断将理论武装的重要性从思想认识层面提升至政治方向、人心向背与执政底气的高度,标志着“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命题的理论内涵日趋完备。

从列宁的思想建党原则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方略,贯穿始终的是理论高度决定先锋队高度这一规律。列宁阐明了理论武装必须与时俱进的根本要求,他强调各国社会党人必须根据本国具体条件,独立地探讨和发展这一理

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sup>[17]</sup>新时代强化理论武装,最根本的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唯有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同频共振、相互促进,党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 健全组织体系是凝聚全党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支撑

在《怎么办?》中,列宁针对党内“手工业方式”的涣散状态,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根本规律。他指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sup>[21][28]</sup>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斗力绝非个体力量的简单叠加,而是依托层级清晰、集中统一的组织体系实现的力量整合与效能倍增,健全的组织体系是将分散的党员意志、基层力量凝聚为统一战斗整体的核心载体,是党能够承担阶级使命、应对复杂斗争的重要支撑。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再正确的理论也无法形成统一的行动,再坚定的信念也无法汇聚成强大的力量。由此,列宁揭示了“政党凝聚力根源于组织体系”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sup>[18]</sup>新时代,党面临“大党独有难题”的长期考验,层级链条长、组织体量庞大,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层级传导中出现“中梗

阻”,部分领域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割裂脱节,组织优势难以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力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架构,从系统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到持续优化各级党组织运行架构、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再到以党内法规严明组织纪律,持续破解大党治理的组织难题。从革命战争年代整合分散革命力量,到新时代保障全党令行禁止、高效运转,时代场景虽变,但组织体系决定政党战斗力的根本逻辑未变。

列宁正确区分了职业革命家核心组织与外围群众组织,这一划分揭示出组织建设“抓核心、固基础”的正确的的方法论,要求统筹把握领导中枢与基层单元、骨干队伍与广大群众的关系。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精准传承并创新发展这一思路,一方面,锚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根本原则,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锻造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通过健全基层党组织、发挥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这套“中枢统领、基层支撑、内外联动”的组织建设方法,为持续提升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提供了正确指引。

#### 参考文献:

- [1] 列宁全集:第 2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列宁全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 张荣臣.党的建设经典著作和文献导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列宁全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8] 贾淑品.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伯恩斯坦言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5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13]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14]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2024.
- [17]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8] 习近平.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责任编辑:马俊

## “做科技企业伯乐，安徽有心得”等六则

### 做科技企业伯乐，安徽有心得

创业与创新密不可分。在经济面临更多复杂挑战时，敢不敢、愿不愿创业，折射一个地方的发展信心，关系未来发展动能。

今年，安徽省推出创业安徽升级行动。自2022年实施创业安徽行动以来，当地年均新登记经营主体125万户、支持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等群体创业20万人以上，日均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

如何做到的？在安徽创业有啥不一样？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看成果转化——办好“儿童医院”，要请“资深医生”**

谈了十几拨投资人，水导激光装备创业者梅领亮没想到，只有合肥科大硅谷的技术经理人真正懂他。

一年多前，梅领亮正陷入“绝境”——经过两年样机研发，账上2000万元自筹资金所剩无几，“继续投，资金链恐怕断掉。现在收手，难道要倒在走向市场的最后一步？不甘心呐。”

对手里的技术，梅领亮有信心。水导激光装备是半导体、航空航天等产业精密加工的利器。此前，该装备被国外厂商垄断，几乎找不见技术资料。而他们自研的水导激光装备，核心部件100%国产。

但一谈到融资，梅领亮直犯愁。“为推介技术，找过一圈投资机构。可投资人只关心盈利情况咋样、什么时候上市。我们前两年都在做研发，肯定亏损呀。”每回谈到这，就谈不下去了。

“无营收，无利润，无抵押物，投入还大，投资者觉得不乐观，我倒认为他们看不懂。”梅领亮不服气，“某半导体企业找我们加工产品，良率从30%提高到90%以上。外国装备搞不定，我们能做

到，多大的市场前景！”

当公司难以为继时，2024年底，科大硅谷公司通过校友资源发现了梅领亮的项目，没多久，技术经理人丁戊辰就上门来了。

“丁戊辰是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的博士。我还惊讶，这么高学历给小企业服务，未免太浪费。”梅领亮回忆。

但丁戊辰一开口，就戳进了梅领亮心坎里。

“见面前，我把国内外有关水导激光的内容都了解了，它技术含量高，前期投入一定很辛苦吧。”丁戊辰说。

“从问技术难点，到了解主要客户，他对技术理解很深，聊得专业，和别人完全不一样。”梅领亮感慨。丁戊辰当即表示，“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企业”。4个月后，2000万元融资款果真到账了。

后来的故事，验证了双方的判断。2025年6月，梅领亮成立合肥科诗特技术有限公司，8月就实现盈亏平衡，此后业务一路增长。

别人看不懂、不敢投的项目，为何科大硅谷看得懂？

丁戊辰这样的技术经理人是关键。

“各地都想投早投小，但科创项目门槛高、估值难、周期长，外行人很难摸得准。”科大硅谷公司董事长吴海龙道出“秘方”，“办好‘儿童医院’，要请‘资深医生’。对初生婴儿般的科创企业，只有真正懂硬科技、懂创业困难、懂产业趋势的人，才能提供精准有效服务。”

去年，科大硅谷设立全省首家技术经理人事务所，人员选自高校院所、科技企业，招募超200人，一年时间就带回600多个科创项目。

聚焦“找人、找钱、找场景”，这支技术经理人队伍让科大硅谷成为科创乐园，吸引企业7000多家，聚集创业者超8万人。

再看看梅领亮。“我们正在扩招，新厂房投用

在即。今年肯定要盈利,只是翻一倍还是两倍的问题。”谈吐间,底气大不相同了。

### 看产业布局——招引和培育企业不能捡进篮子都是菜

从业十五载,臻驱科技(芜湖)有限公司厂长韦淇山没想到,在位于芜湖市的繁昌经济开发区建厂,效率这么高,效益这么好。

“从签约、建厂再到产品下线,只用133天,速度远超预期!”回想一年多来的经历,韦淇山难掩兴奋,“2024年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就上规,营收超过2000万元。”

臻驱科技总部位于上海,主营产品包括电机控制器,这是新能源汽车的动力“大脑”。

放眼全国,新能源汽车重镇不少,为何来芜湖创办企业?

“一个企业选择哪里扎根,首先看的是市场。”韦淇山讲起门道。芜湖汽车销量占安徽省近六成,链主企业奇瑞,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

链主强、产销量大,市场就不愁了。

臻驱科技洁净车间内,产线繁忙运转,生产出一套套电机控制器。而奇瑞埃科超级工厂就在一公里外,产品出厂后直达链主。

“去年工厂给链主企业供货25万套,今年前两个月供货量同比翻番,预计全年超过50万套。”韦淇山信心满满。

“再一个,要看产业配套强不强。”韦淇山分析,尽管多地都搞新能源汽车,但发展汽车电子业务的不算多,“偏偏在芜湖,就有多家深耕传感器、微型控制器的汽车电子企业,在人才和技术上对我们有帮助。”

区域协同,是芜湖的又一优势。

看产业链上游,芜湖深度嵌入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圈。“产品所需的板卡、压铸件等零配件,八成都在江浙沪。”韦淇山坦言,公司在别地也有工厂,过去光运输零配件就要好几天,现在当日可达,成本低了、效率高了。

还有一点,是给力的支持举措。

“有一次开工在即,工厂必须新建电路。当时临近假期,没想到我们提出需求后,有关部门不到一周就完成电力改造。人社部门也多次走访,帮忙引进急缺的高层次人才。”这些服务细节,让韦淇山至今难忘。

汽车是芜湖经营多年的首位产业,并不缺乏参与者。当地为何对臻驱科技这类中小企业呵护有加?

“汽车产业竞争激烈,要再往上走,必须构筑错位协同、特色集聚、梯次发展的产业格局。像臻驱科技,是为数不多可以提供电机控制整套解决方案的企业,有稀缺性,有增长潜力,这正是我们补强产业拼图所需要的。”繁昌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范宁说。

壮大产业,以市场吸引企业;培育企业,以创新赋能产业。这样的良性循环,有利创业生态,助益地方发展。近3年,繁昌经开区新增初创企业84家。

“招引和培育企业不能捡进篮子都是菜,招哪家不招哪家,投什么不投什么,我们不跟风,着眼点始终放在含‘科’量和含‘金’量上。”范宁说。

### 看创业氛围——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一年半内,员工从12人到70人,营收从不足千万元到超亿元,滁州明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家明没想到,滁州创业包容性这么好,公司发展速度这么快。

秦家明今年27岁,在湖北读大学时就参与人工智能创业项目,琢磨出一套垂类大模型算法。

虽有创新成果,想落地却屡屡碰壁。从2024年初起,秦家明往返20多个城市洽谈,几乎毫无进展,“人家可能看我太年轻,想取得信任不容易。”

转机发生在2024年3月8日。“我拜访了滁州的中新苏滁高新区管委会。一周后,管委会竟派出10人团队回访。一个月后,双方敲定合作细节。半年内,公司正式挂牌。”秦家明对创业历程记忆犹新。

对于要不要接纳这名年轻人,管委会也掂量过:“之前引进的多是装备制造等大项目,这小团队能行吗?”“一开口就要投资几百万元,要价太高了吧?”

“领导班子连着议了两次,最终决定投下信任票,帮其引入600万元天使投资。”管委会副主任张瑞说,当时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近乎空白,他们研判秦家明的项目资产轻、角度新,是个突破口。

落户中新苏滁高新区后,秦家明很快感受到这里的温暖服务。

公司正式挂牌前,为更好连接科研资源,秦家

明希望以公司名义成立一家人工智能研究院,不料申请材料却被打了回来。

“我们是省里第一个想搞民办非营利性人工智能研究院的企业,审核标准比较严。”秦家明一度担忧,如果等补齐材料再重新申请,怕是赶不上公司挂牌了。

时任中新苏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王宪亮了解情况后,第二天就带着他到民政部门说明情况、补齐材料,几天之内,研究院就完成注册。

对于大模型企业来说,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是关键。

行走中新苏滁高新区,时常能看到无人机在空中盘旋,识别到路面垃圾或违停车辆后,无人机会把照片上传给管委会。

“这就是管委会提供的政务场景,我们借此优化算法模型,实现更好的技术效果。”秦家明说。

与中国铁塔滁州市分公司合作搭建全域视联网平台,与中国电信滁州分公司联合研发行业大模型……有管委会推荐场景,公司快速打开市场,去年营收达到1.37亿元。

中新苏滁高新区还定期举办“链上苏滁”系列活动,让企业家有更多机会聚在一起、畅聊合作。

“我不仅在活动上谈成订单,还结交了一群好伙伴。”每当秦家明走出滁州,他都主动推介当地政策,“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7月份,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安徽省主办的‘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赛活动将在安徽举办。”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大力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培育差异竞争、特色鲜明、活力迸发的创业生态,推动创业理念、政策、服务深度融入城市发展和产业升级。

(作者:邱超奕、罗阳奇;来源:《人民日报》2026年4月)

## 中国科大的“创新辩证法”

自然指数研究领导者年度排名,是一份衡量全球顶尖科研产出的权威榜单。你知道2025年中国哪所大学排名最高吗?

答案,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它在榜单中位列中国高校第一、全球高校第二。

这所大学强悍的创新能力从哪里来?

记者日前在该校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调研时,实验室副主任江俊教授讲了三个创新故事,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窥得一二。

### 故事一

#### 重构范式,以新逻辑代替旧思维

2020年夏天,正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博的叶盛,被一道难题给绊住了。

此前,他用生物分子结构预测人工智能模型做出了一个抗菌多肽蛋白,被安徽一家生物制药企业相中。这本是好事,但企业提了一个要求:“这个蛋白耐药性很好,能不能把其他性能也提上来?”

让蛋白具有多重功能,一直是业界的难题,几乎没有人解决得好。叶盛苦苦思索,没有找到合适方法,一时陷入了困境。

“别在一条路上死磕。正好有个研学夏令营,你去帮帮忙,换换脑子。”江俊看出了学生的困惑。

夏令营里,叶盛教中学生玩扩散生成算法:一张建筑图和一幅画作,大模型将各自特征提取出来后进行扩散,让建筑染上画作的色彩,呈现炫酷的艺术效果。

江俊为人幽默,平素和学生相处融洽。有学生拍下江俊的照片,和老师开了个玩笑——将江俊的照片与一张美女图片融合在一起,生成的新图让江俊“拥有了女神的美”,逗得全场哄堂大笑。

一道灵光倏地闪过叶盛的脑海:“图像能融合,蛋白质的结构信息为什么不能?”

传统生物学者根本就不会生出这样的念头。为什么?因为工作量太大。没有精准智能化学实验室前,一个学生一天也就能完成一个样品。但现在不一样了,学生回去睡觉之前把任务一设定,第二天早上起来,200多个样品就完成了!

平台的赋能,让叶盛的想象力尽情释放。他找来抗菌很好的蛋白100个、抗炎很好的蛋白100个、高温下能稳定的蛋白100个……一轮轮扩散,最终,得到了一个兼具抗炎抗菌高温稳定性能的多肽蛋白!

这个蛋白,达到了那家生物制药企业的要求,也让叶盛拿到了来自科大硅谷“基金丛林”的5000万元融资。

按:叶盛“脑洞大开”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创新思维,受照片合成启发,从而产生了蛋

白合成的思路;另一个原因,生物分子结构预测人工智能模型的出现,让蛋白合成有了可能。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科研的工具和范式正在发生巨变。从叶盛的经历可以看出,搞科研绝不能墨守成规,只有打破传统,才有创新,也才能发展科学。此外,作为科研人员必须积极进取、大胆尝试。叶盛成功了,与他用机器人和大模型替代手工试错很有关系。没有这种大胆尝试,哪怕有再先进的设备,能有多重功能的蛋白新产品出现吗?不会有。

## 故事二

### 敢于质疑,以新视野挣脱旧束缚

没想到,困扰院士的防火阻燃难题,竟被一个刚入学的博士给解决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老师,我想做新的防火阻燃材料。”2023 年秋的一天,博士一年级学生方天成找到江俊。方天成看到新闻里电动车电池起火,30 秒就把车上的人吞噬的情景,感觉很痛心。

江俊告诉方天成,这个方向有院士带着重点实验室在做,多少年过去了,都没有成功。“就你目前的条件,可能性恐怕不大。”

“我用大模型做了海量文献挖掘,发现传统路径就是把火围起来,烧不穿材料,但问题是能量还在,尤其是电池能量这么高,爆发性更大。”方天成早有准备,他掏出平板向江俊解释,“所以,我们应该换个思路——把热给消耗掉。”

把热消耗掉,就得用到相变。最简单的相变,是水从液相变成气相,这个过程会把能量带走。

“目前能够超过水的相变材料还没找到。莫非你有其他路径?”江俊认真追问。

“我在矿业冶金领域找到了三条相变路径,都很成熟。”小伙子点开平板上准备好的资料说,“很多人做科研有路径依赖,总是跟着老路子走,有时候思路一换天地宽。”

江俊震惊了。他意识到:这路可行!

江俊给方天成申请了一间 20 平方米的独立实验室。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方天成利用大模型,获得成功。

他做出的材料有多牛?传统的防火阻燃材料在 1400℃高温下,3 毫米厚的材料只能坚持约 30 秒,他们研发的材料可以坚持几十分钟。

一次,安徽省省长王清宪到实验室考察,方天

成将阻燃材料放在省长的手上,再在上面放一块铁,火焰喷枪烧融了铁,但手没事!

有了这层保护,遇到电动车电池起火,车上的人起码有 10 分钟逃生时间。

材料很快应用在了安徽消防总队的消防服、奇瑞汽车的防火脚垫上。

最近,江俊接到中国科学院领导来电:“这个学生不要写博士论文了,马上毕业,我们还有新的任务给他。这样的人才,就要超常规使用!”

按:方天成能成功,与中国科大给他提供的环境有关。试想:方天成提出“用相变原理去消耗热”,如果导师一句话就给否了,还能有现在的结果吗?肯定没有。

俗话说得好:“好苗要好土,好树要好根。”导师江俊的眼光,学校政策的支持,中国科学院的“超常规使用”,是方天成成长的“好土”“好根”。正是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包容、这种“敢给年轻人机会”的魄力,让方天成的才华得以充分施展。

确实,科技创新,从来没有“资历”的门槛,只有“能力”的比拼。为有才华、有闯劲的青年科研人员提供舞台,中国科大的这个“赞”,我们必须点。

## 故事三

### 跨界融合,在无用中看见有用

“实验淘汰的样品怎么办?”这个问题,曾经深深困扰陈控。

陈控是中国科大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的副研究员,他在学校的机器化学家平台做催化剂,实验过程会产生大量淘汰样品。

搞化学的都知道,万里挑一是实验常态。那些被淘汰的只能扔掉吗?这可都是花钱做出来的。

2024 年,听说江俊团队有一个能跨领域思考的机器化学大模型,陈控决定找它给出主意。

“这个材料可以干啥?”陈控把淘汰材料的基本特征输入大模型,这样问道。

“大模型的建议很多。比如,推荐做电解液,我们试了,不行;推荐做光刻胶,我们试了,也不行。”陈控笑着说。

直到有一次,它蹦出一个意外的建议:“试试杀虫剂。”

陈控怔住了——瞄准催化剂创制的他,从来没想到跟农学扯上关系。但他没有急着否定,而是顺着这条线索追了下去。

很快,他发现了门道:废弃催化剂上的金属离

子,和传统农药波尔多液的核心成分很像。波尔多液已经用了 100 多年,管用,但其中的铜离子会残留在土壤中,日积月累形成污染。

团队进一步攻关,使杀菌效果不变,用铜量却降到传统制剂的 20%,土壤残留更是减少了 90% 以上。一款高效农药由此诞生!

如今,这种农药已在 30 个省份验证,推广面积超 300 万亩。

“化学物质都可以物尽其用。那些所谓的废弃物,不过是还没放到该去的地方。”江俊感慨。

按:搞科研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在自己的学科里做到极致,却对墙外的事情视而不见。陈控的经历恰恰说明:一“跨界”,一“链接”,创新就出现了。

科技创新中,最可惜的浪费不是实验失败,而是把很多本该交集的知识,硬生生关进了各自的抽屉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科技创新最宝贵的,就是拆除学科壁垒的自觉,让跨界变成桥梁。

让所有本该交集的知识,都有机会融合成改变世界的力量。这是陈控“跨界融合”给我们的启示。

创新没有灵丹妙药,但有规律可依。这几个创新故事,本质上是对阻碍创新的三道关卡的突破。

能突破,背后的缘由值得我们深思细究。这些突破,对所有的院校和科研单位不也都有借鉴意义吗?

(作者:陈品高、谢文、常河、崔兴毅、丁一鸣;  
来源:《光明日报》2026 年 5 月)

## 靠“量子算力”丈量未来

安徽合肥高新区云飞路全长不过 3 公里,沿途却集聚了 30 多家量子科技龙头企业,因此得了个响当当的名号——“量子大道”。

换上防尘服,走进超净环境下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了入驻“量子大道”的合肥本源量子团队。作为中国第一家量子计算企业,自 2017 年成立以来,年轻的团队沿着量子计算这一尖端赛道,跑出了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

面前是我国第一条量子芯片生产线,一场人与微观世界的“较量”正在这里进行:技术人员先操作无损探针台,“火眼金睛”般筛出存在缺陷的

“病号”;再用激光退火仪对量子芯片进行“微创手术”,精准剔除瑕疵,修补局部缺陷……

“这是我们正在研制的下一代超导量子芯片。”团队量子芯片负责人贾志龙指着显微镜下那结构精密的芯片,对记者说,“上一代‘悟空芯’已经在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上稳定跑了两年多,为全球 163 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了超 4700 万次访问服务。下一代,我们要让它算得更快、更准。”

和芯片同样重要的,是量子计算测控系统。它是整个量子计算机系统的“神经中枢”。眼下,团队正围绕下一代可操控更高量子比特的测控仪器发起新一轮“冲锋”。“在系统研发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没有任何经验可循,成绩是靠‘摸着石头过河’,一次次试出来的。现在,我们更要拿出闯的劲头、创的勇气,继续‘试’出个未来!”贾志龙信心满怀地说。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团队深知,让量子算力真正“用起来”,是眼下最紧迫的任务。

贾志龙带着记者走进另一间实验室,电子屏幕上跳动着密密麻麻的数据,显示的是“本源司南”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开放下载以来取得的成绩。“它是全球首个面向公众开放下载的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现在开放下载刚满一个月,数据比预想高多了!”团队软件负责人窦猛汉从屏幕前抬起头,兴奋地说。

“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机会使用这套系统,构建起真正活跃的自主量子计算生态,帮助更多开发者有工具可用、有场景可做,实现自己的科研理想。”窦猛汉话语里透出憧憬。

“量子科技看上去很‘高冷’,实际上,它正在悄悄改变你我的生活。”正在一旁查看数据的团队首席科学家郭国平也加入了对话。

他介绍,当前,在生物医药领域,团队联合多家医药机构,实现了小分子药物设计等多项应用验证;在人工智能领域,完成了全球首次近百亿参数级别 AI 大模型的微调任务;在超算、图像识别、金融等领域,也正加紧布局……面向“十五五”,他们全力推动量子计算从“书架”走向“货架”,让更多行业敢用量子计算、先用量子算力。

“从‘可用’迈向‘好用’,是一场需要耐心的持

久战。现在,这场‘战争’正进入关键阶段。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以场景应用驱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量子计算真正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升级。”郭国平语气凝重。

(作者:丁一鸣、常河;来源:《光明日报》2026年4月)

## 从“网红”三件套到“长红”全域旅游——安徽滁州农文旅融合发展观察

2026年春节,一块高速公路广告牌上对“明绿液”的误读,让安徽省滁州明光市这座皖东小城意外走红。“开了一上午,还没开出‘奶绿波’”——网友的调侃迅速刷屏。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明光市没有“看热闹”,而是果断“接梗”。不到10天,由“明绿液酒”“奶绿波奶茶”“旺绿波绿豆糕”组成的“明光三件套”全面上市,线下体验店开张首日便人头攒动。

一款老酒、一杯奶茶、一块绿豆糕,何以撬动亿级流量?滁州市委书记吴劲认为,表象是一场“误读营销”的成功,内里却藏着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层逻辑:以“明光绿豆”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内核,以网络传播为抓手,将农产品加工、文旅消费、城市品牌塑造打通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明光三件套”的出圈,恰是滁州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生动注脚。放眼全域,这场以农业为基、文化为魂、旅游为桥的实践,正在皖东大地铺展出一幅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 “接梗”背后的农文旅叠加效应

“明光三件套”的成功并非偶然。它的底色是明光市深厚的农业禀赋:“明光绿豆”为明代皇室贡品,豆粒大而整齐,绿如碧玉;明绿液酒传承南宋“金陵御酒”工艺,20世纪80年代便被誉为“酒中奇花”。2021年,古井贡酒与明光酒业战略合作后,品牌势能持续释放。

明光市委、市政府敏锐捕捉到网络热度背后的机遇,整合16个职能部门力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的全链条工作体系,10天内完成从热点发酵到产品上市的全流程。在明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姚正玉看来,这正是政府做主动担当的“助推者”,引导企业挖掘特色资源、对接消费需求的成功实践,让“流量”真

正转化为“留量”。

在明光市石坝镇,67岁的绿豆种植户孙德才种了半辈子“明光绿豆”,头一回感受到“网红”的滋味。由于“三件套”里的“旺绿波绿豆糕”供不应求,企业要按保护价收购。“一亩地收了260斤绿豆,一斤要多卖两块四,光这一项就多挣将近5000块。我种了这么久地,没想到绿豆还能成‘网红’。”孙德才笑着说。

近年来,明光已初步将江淮分水岭旅游风景道建成展现生态美景的“风景线”、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线”和帮助农民增收的“发展线”。黄寨草原静港营地获批2025年度“皖美消费”新场景,石坝镇东贾村将废弃矿山改造为2000平方米的窑洞民宿,实现了从单纯住宿向“有温度的宿处、有深度的体验”转型。

### 四季农歌会带动乡村旅游消费

4月,一场主题为“四时有序 大地飞歌”的中国农民歌会春季篇暨滁州市农文旅嘉年华在凤阳县小岗村亮相。活动现场,滁州市文旅局局长王连侠告诉记者,这场歌会以四季为脉、节气为轴,创新构建“4+24+N”活动架构:春夏秋冬各一场大型主题歌会,全年二十四节气当天在全市特色美食乡镇开展小型歌会,让农歌会变成“全年流淌的歌声”。“田园好声音”大赛、乡创交流、田园音乐会等多元活动轮番登场,民歌大赛围绕“歌颂农村、赞美农民、反映乡村振兴”主题激情开唱。

以歌为媒、以文塑旅、以旅彰农,这场活动将农民文艺创作、乡土文化展演与乡村旅游推介深度融合,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注入了强劲动力。附近村民纷纷亮出手艺,自家做的绿豆丸子、手工粉丝和辣椒酱等都拿出来展销。“两天卖了8000多块,比平时在集市上一个月的收入都多。”村民李金凤说,最让她意外的是,几位从合肥来的游客加了她的微信,说以后要定期网购,“以前总觉得游客就是来逛逛,买点纪念品就走,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是真的认咱这土味儿。”

“五一”假期前,来安县承载水乡古韵的文旅新地标——兴茂水镇亮相。这个距离南京市区车程不过半小时的小镇吸引了众多江苏游客前来游玩。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互动打卡等内容吸引八方游客。

“两块大英酥烧饼,再配一碗牛肉汤,是我们大英镇百姓最爱的早餐。”在景区“秧歌灯下·三味

馆”，烧饼铺老板张德荣向游客介绍。几位来自南京的游客品尝后连连称赞。

来安县 12 个乡镇的特色商户入驻兴茂水镇，既丰富了业态，也借助“流量”将自身的美食、美景和文化推介出去。凭借靠近南京、滁州的地理优势和山清水秀的生态，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主线”，串起池杉湖、皖东烈士陵园等景点，加上一批集采摘、休闲、研学于一体的生态农业项目，让乡村游既有“乡土味”，又有“新玩法”。

### 历史传统文化成为引流爆点

作为历史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农业大市，如何将这些资源活态转化是滁州一直在探索思考的命题。

醉翁亭、琅琊山以“文脉承千年，庙会焕新颜”的思路吸引着年轻一代。琅琊山管委会副主任戴莺介绍，我们没有将传统文化束之高阁，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准打法，将欧阳修等文化符号转变为可互动、人格化的鲜活 IP。在春节庙会上融入“寻九福”打卡、蹴鞠、投壶、诗词接句等古风游戏，同时打造“人乐市集”，汇集啤酒、烧烤、小龙虾等美食；夜间推出山体激光秀、国风音乐节，举办“声动琅琊音乐秀”，打造“日间祈福，夜间赏灯”的全时段体验，夜游人次大增。依托自然生态资源，引进“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森林漂流及森林滑道等项目，配合星空音乐会、专业观星活动，让传统文化与潮流玩法相得益彰。

吴敬梓故里全椒县以“儒林文化”为核心 IP，通过全产业链深度整合，成功将文学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旅游产品。在文化活态传承方面，全椒打出多维度创新“组合拳”：启动“儒林故事新编”计划，策划以《儒林外史》经典篇章为蓝本的沉浸式微剧场演出；深度挖掘书中饮食文化，打造“一菜一典故、一味一传承”的“儒林宴”特色美食 IP；吴敬梓纪念馆打造“儒林文化+智慧旅游”新模式；当地还创新推出“说唱音乐+文旅”项目，原创《吴敬梓》等说唱歌曲，以青春化表达触达年轻群体。全椒县以吴敬梓纪念馆、故居等核心文化地标为支点，以椒岭风景线为主轴，联动太平古城、黄栗树风情小镇等景区，整合小龙虾、碧根果等特色农产品，推出“太平祈愿·明韵乐游”等主题线路，形成了“名人故里+生态观光+农事体验+美食消费”的多元产品体系。

天长市秦栏镇作为宋代二十四孝之一“朱寿

昌弃官寻母”故事发源地，深挖孝文化，重修孝子祠，保护孝子树，在孝亲文化园内，寿昌塔、思母亭、同仁书院等秦栏镇特色孝文化 IP 林立。除了感受学习孝文化，游客一定会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秦栏卤鹅。当地居民刘庆芳说，自从孝亲文化园建成，游客多了起来，她的卤鹅和鹅杂供不应求，“周末游客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二三十只，收入两三千元。”最让她感动的是，镇里文旅公司主动找她对接，把秦栏卤鹅开发成“孝亲伴手礼”，包装盒上印着“孝亲敬老·鹅寄深情”的文案。“去年中秋节，一家单位一次就订了 500 盒。”刘庆芳笑得合不拢嘴，“我就是个养鹅的农民，没想到也能搭上文旅的顺风车。”

“三件套”的走红带来了“人来了、货走了”的经济效益，但真正能让游客反复回访的，永远是这片土地之上“山水相依、人文交汇”的独特气质。滁州市市长胡春华坦言，对于滁州而言，“三件套”是一次漂亮的起跑；真正的考验，是如何把这条农文旅融合的道路走得更宽、更远、更可持续。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节点城市，滁州正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轴、以农文旅融合为抓手，将“流量”沉淀为“留量”，将“网红”做实为“长红”。

（作者：杨志华、黄朝武、杨丹丹；来源：《农民日报》2026 年 5 月）

## 安徽合肥：从“应用”出发托举 商业航天梦

春节刚过，昊盛科技集团副总裁林海峰就打点行李准备奔赴安徽合肥。“我们与当地的高频轨卫星合作项目正在加紧推进当中。”手握珍贵高频轨资源的昊盛科技集团，决定将项目落地合肥，春节前后的一段时间，林海峰多次往来合肥。

2025 年，商业航天——这个小众且门槛高的赛道，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当风口骤起时，合肥已在这条赛道上深耕了 3 年多。

### 切入商业航天赛道

与北京、上海等传统航天重镇相比，合肥并没有航天领域“大院大所”的资源。3 年前，合肥全市与空天信息相关的企业仅有三四十家。

“合肥干商业航天，几乎没有什么先天基础。”

合肥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青山坦言。

随着深空探测实验室的落地，合肥决定切入这个赛道，由市领导挂帅、市投资促进局牵头，成立了产业链推进组。

然而，合肥没有选择当时被热捧的火箭制造，而是走了一条看似迂回但更稳健的路：从有明确付费意愿的下游应用切入，以应用养研发，以市场育制造。

“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技术有多前沿，而是商业运营模式。离开政府输血后，让企业自己能活得下去。”李青山说，“那时还没有这么多的卫星发射需求，庞大的生产基地如何消化未来的产能？”经过对头部火箭企业的深度调研，他们发现大型可回收火箭的商业逻辑并不清晰。

遥感数据应用成为理想的起点。合肥把目光瞄向国土监测、环保督察、农业估产、应急救援——这些政府与行业的需求真实且持续，能为数据服务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

2021年11月，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与合肥市政府签署全面合作协议，中科星图“GEOVIS 数字地球全球总部项目”落地合肥。

“我们从下游的应用做起，逐步感知到数据获取、处理环节的痛点，再向卫星测控乃至卫星制造延伸。”中科星图副总裁李会丹说。

如今，中科星图在合肥陆续成立了9家子公司。其中，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2025年1月2日正式登陆北交所，成为“北交所商业航天第一股”。

为了帮助企业跑通模式，合肥主动开放城市级场景。李会丹对此感受深刻：“政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场景支持，比如城市治理、应急管理、生态环境、低空经济等。”在合肥骆岗公园的低空试验场，中科星图的“空天地”一体化能力得到了融合验证。

### “合伙人”的默契

这套闭环思维，同样体现在合肥与资本的合作上。

2023年，沙钢集团旗下的产业CVC锦沙资本，因一个火箭项目与合肥市初次接触。“那时候商业航天还是小众行业，像合肥这样对其有深刻认知的地方，还真不多。”锦沙资本合伙人刘尚说。

2024年6月，由锦沙资本与合肥产投等共同发起、规模13亿元的产业基金正式设立，成为合

肥首只专注于商业航天的市场化基金。

“合肥政府和我们谈合作，很少单纯比拼政策补贴的力度，更多是探讨产业链哪个环节最缺资金、哪种技术路径最可能率先跑通商业模式。”刘尚说。

2025年，通过锦沙资本的推荐，专注于液体小火箭的“星火空间”落户合肥新站高新区。

经过3年“从下游向上游”的牵引，合肥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已悄然成形。企业数量从最初的几十家增长到165家，产业规模突破百亿元。

2025年，合肥提出了一个更庞大的构想——在合肥打造“巨型星座”体系。“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项目，更是一个能够实现通导遥一体化、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天基信息承载网络。”李青山解释说，这个星座旨在整合已在本地落地的中科系、银河航天、国电高科等星座资源，解决当前低轨星座“小而散”、重复建设的痛点，构建“高中低轨协同的空天信息一张网”。

目前，合肥在高、中、低轨的布局已初步实现：国电高科的“天启星座”一期不久前完成全球组网，成为国内首个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吴盛科技集团旗下的九盛卫星作为拥有珍贵高频轨资源的企业，其天基承载网星座项目落户到合肥……

合肥用3年时间，在商业航天赛道上从真实的应用需求出发，一步步构建起完整的产业生态。

（作者：吴长锋；来源：《科技日报》2026年2月）

## 技术突破、产业集聚、场景拓展—— 商业航天产业全链提速

商业航天作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正迎来技术突破、产业集聚、场景拓展的全面提速期。当前，多地立足自身优势，在运载装备研制、发射服务升级、卫星产业量产、航天生态构建等领域精准发力，逐步形成技术迭代快、产业布局全、应用场景广的商业航天发展新格局，推动中国商业航天迈入产业化发展新阶段。

### 火箭卫星迭代升级

运载火箭与卫星是商业航天的核心装备。各地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实现火箭谱系化发展、卫星规模化量产，核心装备制造能力实现跨越式

提升,为商业航天发展筑牢硬件根基。

近日,位于浙江绍兴诸暨经济开发区的众星志连(诸暨)航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微纳卫星核心部组件生产基地建成投用,该基地定位为高端航天部组件批量制造中心,主要从事结构机构、姿控部组件的研发、生产,能够满足一颗微纳卫星绝大部分核心部组件需求。

在杭州市钱塘区箭元科技中大型液体运载火箭总装总测及回收复用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施工。该项目是国内首个面向海上回收复用的火箭产能基地。“预计今年8月底,首枚可复用火箭‘钱塘号’将完成总装,年底迎来首发。”箭元科技创始人、董事长魏一表示,该公司已与地卫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载荷合作,“浙产火箭发射浙产卫星”的场景正渐行渐近。

在广州,国内领先的商业航天企业中科宇航已形成覆盖1.5吨至40吨运载能力的力箭系列火箭谱系,“力箭一号”迈入规模化量产和常态化运营阶段,累计11次发射将84颗卫星、超11吨载荷送入预定轨道,成为国内民商火箭发射市场主力型号。“力箭二号”正筹备首飞。力鸿系列可重复使用飞行器更是实现从“送卫星上天”到“带应用上天”的突破,“力鸿一号”完成亚轨道飞行试验,承担微重力实验、太空制造验证等前沿任务。

#### 发射服务降本增效

发射服务是商业航天产业的关键环节,各地依托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持续提升发射频次、完善发射配套,推动发射服务向高频次、航班化、全闭环发展,同时构建起集发射、回收、检测、复用于一体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大幅降低商业航天运营成本。

不久前,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1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自2024年成功首发以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共成功完成12次发射任务,累计将1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并已具备“五天两发”和“一月三发”的作业能力。海南商业航天迎来了跨越式发展。

火箭链上,火箭院海南总装测试中心揭牌,火箭装配厂房全面运行,星际荣耀运载火箭总装总测复用工厂(一期)竣工,可重复使用火箭海上回收系统开工建设,星际荣耀双曲线3号运载火箭

进入试验阶段。海南星际荣耀董事长、总经理何光辉介绍,双曲线3号运载火箭近期将按流程开展转场起竖系统联调试验、一级二级动力系统试车试验、海上联调试验等关键大型试验,以全面验证火箭性能及各系统协同可靠性,为2026年首飞奠定基础。一个集“发射—回收—检测—复用”于一体的全流程商业闭环正在文昌加速形成。

广州则构建起“研发多地协同、测试和实现端扎根广州、发射端对接全国”的发展模式,在南沙、从化、黄埔分别布局总装测试基地、液体动力系统试验中心、发动机产业基地,形成火箭研制、试验、生产的完整基础能力,同时与甘肃酒泉发射场深度联动,实现研发制造与发射服务的高效协同。

#### 全链布局协同发力

商业航天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完善的产业生态与丰富的应用场景。各地以核心企业为牵引,以政策资金为支撑,构建起“研发—制造—发射—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同时推动航天技术与多产业融合,拓展“航天+”应用场景,实现产业生态与应用场景双升级。

在产业生态构建方面,各地形成了“链主企业牵引+上下游集聚+政策资金支撑”的发展模式。

安徽蚌埠将商业航天产业作为全市重点发展的六大产业集群之一,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已从“一企引领”发展到“群企集聚”。在此基础上谋划的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规划提出“1+4+N”布局,即建设1个商业航天科技创新中心,4个基地即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卫星制造基地、可回收商业航天飞行器总装基地、新材料生产基地,多个商业航天产业融合平台和应用场景。

目前,蚌埠已成功引进并集聚九州云箭、凌空天行、深蓝航天、星河动力等火箭制造领域头部企业,椭圆时空、航天驭星、天仪研究院等卫星研发制造领域骨干企业,以及知行合一、双环电子、易科奇、大富科技等关键部件配套领域核心企业。全市30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形成从火箭总装、发动机研发到零部件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浙江台州湾新区是浙江省较早布局商业航天的区域,目前已构建起“一箭五星四机”的特色产业格局,集聚空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84家,依托总规模40亿元的3只产业基金,创新打造“基金+园区+政策”全周期赋能体系。

目前,台州湾新区已布局时空道宇旗下星空

智联吉利卫星超级工厂，作为全球首个深度融合航天制造与汽车制造能力的卫星量产基地。时空道宇 CEO 王洋介绍，公司已率先建成除南北极外全球覆盖的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所有卫星均从台州卫星超级工厂出厂。

在应用场景拓展方面，各地推动商业航天从“上天”到“落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航天+”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每逢火箭发射，来自全国各地的航天爱好者齐聚文昌，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行业。随着文昌航天科普中心、极星陨石博物馆、航天育种中心、瑶光观礼平台等场馆相继投入使用，航天旅游从观礼观光向研学、科普、文创、体验深度拓展。航天 IP 让文昌不仅是火箭发射地，还是热门旅游目的地。

在广州，中科宇航公司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建“太空医学联合研究中心”，围绕微重力

环境下的组织工程、药物结晶、生物制造等开展研究，探索太空医学、太空制药新体系。

(作者：王伟、李景、梁睿、喻剑；来源：《经济日报》2026 年 3 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 启 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上接第 36 页)

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共同构建起既有“数字速度”又有“民生温度”的立体化治理体系。第二，强化文化传统与情感联结在数字时代社会治理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文化传统与情感联结，是数字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可忽视的命题。数字技术可以拓展认同形成的空间和渠道、提升治理效率，但其传递的是信息而非温度，连接的是端口而非人心。在推进数字化治理的同时，必须充分珍视并主动激活物理空间中的文化资源与情感资本。要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文化广场等阵地，常态化开展道德讲堂、邻里互助、文体活动等，增强民众的认同感、归属感。同时运用数字化工具放大文化活动的触达面和参与度，以线上发动引流线下参与、以线下活动反哺线上社群活跃热度，实现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情感同频。将数字算力转化为物理空间的治理效力，让治理既有数智的效率，又有情感的厚度。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26-03-14.
- [3]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4] 安小米,许济沧,王丽丽,等.国际标准中的数据治理:概念、视角及其标准化协同路径[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5):59-79.
- [5] 张树华,邵宏伟.数智赋能超大城市治理:内在机理、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J].行政论坛,2025(5):30-40.

责任编辑：徐书琴

强主明谐由等正治国业信善  
富民文和自平公法爱敬诚友



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

周易 中石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 0551 ) 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